

從客家族群之形塑看清代臺灣史志中之「客」 —「客」之書寫與「客家」關係之探究

林 正 慧

摘 要

「客家學」自 1930 年代羅香林提出其客家界說、客家源流及遷移等見解以來，自此而後的客家研究，多接受其說法，如客家一系形成於趙宋、客家基本分布地域為閩贛粵三地、客家方言傳承中原漢音等等。此後關於客家研究的討論，卻始終難以擺脫族群情結的糾葛。在客方言人群的形塑過程中，客家與中原漢族之關係不斷被強調與重塑。於是，時序愈往後，所謂客家民系的形成時間愈被往前推進，與此同時，許多文獻上「客」之書寫，成為詮釋客家源流的有力證據，造就二者之間 昧難明的糾葛關係，但卻也可能因此模糊了歷史原貌。「客」之書寫與客家之關係，不僅表現在對客家溯源方面的討論上，在清代臺灣客家的相關研究中亦復如此。因此，本文關注的是，在客家形塑的過程中，乃至於之後受客家自我意識高漲下所成就的客家研究中，有多少部分是脫離了歷史事實而被建構出來或被誤解的。客家方言人群的形塑有其階段性，可視為中國歷史上移民運動中，不同文化共性人群因互動而區別出來的認同意識。因此，不應逕將史籍中的「客」全用以解釋客家源流或客家之歷史經驗，需回到歷史時空的脈絡下重塑或理解當時的族群關係。而清代臺灣史籍中的「客」除了部分意指相對於「土著」的閩粵移民外，應為「粵」之意，故其「客」之書寫非指方言人群的「客家」。往後對於清代臺灣漢人族群關係的相關研究，若能避免逕以文獻上「客」之書寫等同於客家民系，以及跳脫出「閩即福，粵即客」的迷思，應較能描繪出更貼近事實的歷史實相及族群關係。

關鍵詞：客家、客民、客籍、客戶、羅香林

An Initial Exploration into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Appearance of “ke” in Historical Materials and the Development of the Hakka Tribe

Cheng-hui Lin*

Abstract

Ever since Lo Hsiang-lin first proposed his views about the definition of Hakka, most Hakka studies have been revolved around the issue of ethnic complex. For example, in defining the Hakka dialects, the relations between the Hakka people and the Chinese people in China were repeatedly emphasized and reformed. Thus, later studies often tried to trace further back the origins and the formation of the Hakka people. In such studies, the appearance of the word “ke,” as found in many books, became the most important evidence, making it more difficult to understand the facts of history. The same problem also appears in the Hakka literature done in the Ching Dynasty.

The formation of the Hakka tribe was a result of a long process of ethnic migration and acculturation. Hence, it will not be justified to regard the appearance of the word “ke” in historical materials as the only evidence for the emergence and the history of the tribe. For example, in many of the historical materials on the history of Taiwan written in the Ching Dynasty, the word “ke” refers to “Yueh (Canton),” not to the people who spoke the Hakka dialect. If we could avoid drawing a direct line between “Min” and “Fukien” or that between “Yueh” and “ke,” we could more correctly present the real history among different tribes.

Key words : Hakka, kemin, keji, kehu, Lo Hsiang-lin

* Associate Researcher, Academia Historica

從客家族群之形塑看清代臺灣史志中之「客」 —「客」之書寫與「客家」關係之探究*

林 正 慧**

壹、前 言

何謂客家？這似乎是客家相關研究中常被問到也常難以被真正解決的問題。「客家學」自 1930 年代羅香林提出其客家界說、客家源流及遷移等見解以來，客家做為一個研究單位，常被視為是一個基本的、不變的範疇，自此而後的客家研究，多接受其說法，如客家一系形成於趙宋、客家基本分布地域為閩贛粵三地、客家方言傳承中原漢音等等。然而，回顧歷史發展軌跡，羅香林的客家研究是源於被汙名化後的族群自覺，於是證明客家人系與中原漢族不可分割的關係，成為羅香林客家學的重點，以致日後關於客家研究的討論，始終難以擺脫族群情結的糾葛。

如同人類學者所言，族群是一種以「文化親親性」為根基，以集體記憶與結構性健忘為工具來凝聚人群，以維護、爭奪群體利益的人類社會結群現象。¹族群通常是一種強調「先天身分」的區辨觀念，但是所強調之「先天身分」的觀念，卻不是「先天」就存在的，它是在特殊的歷史脈絡中被建構、推廣的。族群意識一旦形成，就會取得一定程度貌似「自然」的說服力，促成其文本性相對穩定，²客家研究即有此傾向，最引人注目的莫過

* 本文承蒙兩位匿名審查人提供寶貴意見，特此致謝。

收稿日期：2005 年 4 月 11 日，通過刊登日期：2005 年 6 月 29 日。

** 國史館助修

¹ 王明珂：〈過去的結構—關於族群本質與認同變遷的探討〉，《新史學》，5 卷 3 期（1994 年 9 月），頁 120。

² 何翠萍、蔣斌：《國家、市場與脈絡化的族群》（臺北：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2003 年），頁 8，〈導論〉。

於對客家民系正統性與優越性的強調。從某種意義來看，客家民系的存在越來越像一種想像，藉以凝聚海內外客家人士的族群認同意識，因此，各種具有鮮明地域文化特色的民間文化被重新發明出來。如原本在贛南和閩西一帶，當地居民的族群認同意識原不如廣東人強烈，今卻有後來居上之勢，閩西被發明為客家祖地，贛南則為客家大本營。此種客家文化資源不斷被發掘、被重新發明的現象，其實正是某種形式的民族主義的地域性建構。³

承前所述，在客方言人群的形塑過程中，我們可以看到，種種足以證明客家與中原漢族關係的先天身分不斷被強調與重塑。於是，時序愈往後，所謂客家民系的形成時間愈被往前推進，與此同時，許多文獻上「客」之書寫，成為詮釋客家源流的有力證據，造就二者之間 昧難明的糾葛關係，卻也可能因此模糊了歷史原貌。「客」之書寫與客家之關係，不僅表現在對客家溯源方面的討論上，在清代臺灣客家的相關研究中亦復如此。然而，中國各地方志及相關史料上「客」之書寫，及清代臺灣相關文獻上的「客」或「粵」之書寫，是否等同於日後普遍以方言群界定的「客家」？這是在進行客家研究之前必須加以釐清的部分。也就是說，我們必須了解的是，在客家形塑的過程中，乃至於之後受客家自我意識高漲下所成就的客家研究中，有多少部分是脫離了歷史事實而被建構出來或被誤解的，此即本文關懷之所在。本文除前言外，第二部分希望能先釐清客方言人群的形塑過程，以此為基礎，進一步檢討史籍中「客」之書寫與「客家」的關係；第三部分則進一步了解清代臺灣史志中，「客」之書寫所指涉的人群意涵，及其與「客家」方言人群之關係。

貳、從客方言人群的形塑過程看史籍中的「客」與「客家」

³ 劉曉春：《儀式與象徵的秩序——一個客家村落的歷史、權力與記憶》（北京：商務印書館，2003年），頁10；劉曉春：〈民俗學問題與客家文化研究——從民間文化研究的普同性與線性視野之困境反思客家研究〉，《江西社會科學》，2004年第1期，頁118-121。

中國歷史上的客方言人群形塑過程如何？史籍中「客」之書寫是否即意指客方言人群？此二者為以下的討論重點。本節將分「客方言人群形成的兩個階段」、「客方言人群為的形塑過程」、「羅香林的客家再形塑」及「史籍中之客與客家」四個部分論述之。

一、客方言人群形成的兩個階段

客家方言人群究竟形成於何時？至今仍眾說紛紜。但若自文獻中客方言人群形塑的過程來看，大致可分為兩個階段：即文化共性形成期、客方言人群意識覺醒期。所謂客家文化共性，即指共同的祖源、方言、生聚地，及文化內涵等等。有學者持論，認為文化共性既已形成，即可宣告客家民系之形成。持此論者，對於客家文化共性形成的時間又有不同主張。如謝重光認為，南宋時期客家人已有穩固的共同生活地域，內部文化一致，且已形成與相鄰地區明顯差異的經濟形式、語言風俗、社會心理，故可說客家民系在南宋時已經形成。⁴

無獨有偶，吳松弟亦認為約在宋末，中國歷史上即已形成具有北方語言和風俗特點的客家民系，且強調北方移民帶入的影響是其所附載的北方文化，而非移民本身的血統。⁵王東則指出客家民系的形成，是一個動態的

⁴ 謝重光亦指出，雖然南宋以後，客家方言本身仍在持續發展變化，但不能以客家方言在南宋以後的變化，否定南宋時客家方言的形成。至於南宋時贛閩粵邊區誕生的新民系是否已被稱為「客家」，其方言是否已稱為「客話」、「客語」，仍需進一步研究。此外，雖說客家民系在南宋已經形成，但並不意味著南宋時的贛南、閩西、粵東三片區都已完全成為客家住域。粵東客家人多數是宋元之際才從閩、贛遷去，南宋時，粵東客家人還很稀少，還未完全成為客家住區，更談不上是形成客家的中心地域。因此，討論客家民系形成時期的中心地域，著眼點應是贛南、閩西。參見謝重光：《客家形成發展史綱》（廣州：華南理工大學出版社，2001年），頁170、179。

⁵ 參見吳松弟：《中國移民史》，第4卷，遼宋金元時期（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7年），頁354-357。此外，房學嘉亦表示，不存在客家中原南遷史，南遷者僅是分散的流動人口，中原流人與當地人相比，都是少數。客家共同體在形成的過程中，其主體應是生於斯長於斯的本地人。客家先民不是中原移民，南方百越民族才是客家族群的祖先。

歷史過程，以不同形態的客家先民遷入閩粵贛三省邊區大本營地區為基本前提。此過程的開端應是以北方人民大規模南遷運動中止為標誌，其完成以由大本營地區遷出之居民能在總體上保留其語言文化特色為標誌。自此角度來看，客家民系的形成，時間上限應在南宋末年至元代初年，下限則在明代中後期。⁶蔣炳釗則認為客家形成的過程是入遷華南的漢人與當地畬族融合的過程。由元代閩東、浙南畬族新的聚居點的出現，反映部分畬族已從原住區向新地區遷移，以及明代畬民大規模反抗鬥爭相對減弱的情形來看，客家的形成可能始於元代，明清時期是客家發展壯大的歷史時期。⁷

以上各家的說法，對於客家民系形成的確切時間看法不一，歸納起來約在宋元明時期。此外，他們所論述的重點多放在客家文化共性的形成上，如共同的地域、生業方式、語言風俗等。持論者多認為只要文化共性形成，即可宣告客家民系即已形成。如認為「按方言與民系的形成同步的原理，當一種共同交際工具客家話在華南山區悄然誕生時，即標誌著客家民系已最終形成」。⁸

然而上述認為文化共性形成即可宣告客家方言人群之形成的說法，多將焦點放在客家文化的特色及內涵，採取一種先入為主的方式，把「客家」作為一個基本不變的研究單位，從靜態的角度來談客家源流、歷史文化，較少以批判的角度檢視「客家」並非一個由來已有的概念，忽略了「客家」的形成其實經歷了一個從「他覺」到「自覺」的發展過程。⁹在 1950 年代

⁶ 王東指出，自南宋末至元代初年開始，中國歷史上大規模北方漢人南遷運動基本中止，明代中葉以後，由大本營遷入其他地區的客家人，無論內地或海外，皆能在總體上保留客家民系的語言和文化特徵。只有當贛南、閩西、粵東北三區居民在總體上已達相當認同，贛南居民已基本上與湘贛系居民區分，閩西居民已基本上與閩南居民區分，粵東北居民基本上與潮州人和惠州人（廣府人）相區分，才能說客家民系已形成。即大本營地區居民有一個內部相互認同的過程，與周邊其他民系亦有一總體相區別的過程。王東：《客家學導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 年），頁 144-145。

⁷ 蔣炳釗：〈試論客家的形成及其與畬族的關係〉，《閩臺社會文化比較研究工作研討會論文集》（臺北：中研院民族所，1994 年），頁 289。

⁸ 何國強：《圍屋裡的宗族社會：廣東客家族群生計模式研究》（南寧：廣西民族出版社，2002 年），頁 2。

⁹ 宋德釗：《民間文化與鄉土社會》（梅縣：花城出版社，2002 年），頁 5-12，〈序言〉。

以前，人類學者的確傾向以共同的語言、血統與文化等客觀因素界定族群，但 1960 年代之後，基於許多田野調查的實際經驗，逐漸體認到族群邊界的形成與維持，是人群在特定的資源競爭關係中，為了維護共同資源而產生的。學術界開始採用「ethnic group」，即以「族群」的說法來取代舊的詞彙。此詞彙的轉變標誌著學術界漸漸揚棄以本質主義（essentialism）的方式來界定或區分人群。也就是說，族群的形成與維持是在某一特定的社會、經濟生態環境中，一群人以自我認同與相互認同，以及共同的他族意識來界定自己，之後才以宣稱共同的族名與共同的起源（文化的血緣關係）來設定及維持族群邊界。¹⁰

毫無疑問地，共同的祖先、歷史、方言和文化淵源是同一族群的基礎，即族群必須是建立在一個共同的文化淵源上，¹¹而這也是所謂的客方言人群形成的客觀要素，即共同的族群文化。然而，族群認同卻必須在族群互動的基礎上發展起來，若無兩種異質文化的接觸與互動，就無從產生族群意識或認同，即先因接觸進而了解差異的存在，才會產生將自己歸類、劃界，這是認同產生及存在的基本條件。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客方言人群不同於其他華南漢族民系以生聚地域為民系名稱，而終選擇一個具有臨時性、不確定性的「客」，作為族群或民系的稱謂，其必定先經過一個與不同族群之異質文化接觸的過程。因為「客」在成為族群自稱之前，必先有一個他族以「客」相稱的階段。換句話說，所謂的「客家」之得名，除了應有的文化共性外，必定歷經一個與不同族群接觸、磨合，進而自我定位的過程。

梁肇庭在 *Migration and Ethnicity in Chinese History: Hakkas, Pengmin*

¹⁰ 王明珂：〈漢族邊緣的羌族記憶與羌族本質〉，《從周邊看漢人的社會與文化》（臺北：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1997 年），頁 130；王明珂：〈周人的族源與華夏西部族群邊界的形成〉，《大陸雜誌》，87 卷 2 期（1993 年 8 月），頁 53-54；楊聰榮：〈從族群關係史看臺灣客家的分類範疇與獨特性〉，發表於「臺灣史學客家研究研討會」，2004 年 5 月 26 日。

¹¹ 周大鳴：〈從「漢化」到「畬化」談族群的重構與認同—以贛南畬族為例〉，收於中南民族大學民族學與社會學學院編：《族群與族際交流》（北京：民族出版社，2003 年），頁 23。

and their Neighbors (《中國歷史上的移民與族群性：客家、棚民及其鄰居們》)一書中，根據 Fredrik Barth 的族群形成理論，¹²認為作為族群意義上的客家，是在與周邊其他族群的互動之中，逐步形成其明確的自我認同意識。即客家所以發展成一個社會學意義上的族群，原因在於他們對外遷移及因此產生的與周邊其他社會群體的「衝突」。客家族群的產生，空間上首先產生於嶺南地區，在時間上應是 16 至 17 世紀，先經過明代的醞釀期，至清代隨著當地經濟週期循環的起伏，與福佬、廣府人摩擦衝突，逐步藉由強化經濟力量，進而凝聚族群間的認同意識，轉型為顯著的文化群體。¹³

梁肇庭所提出的理論獲得劉佐泉《客家歷史與傳統文化》¹⁴、陳支平《客家源流新論》¹⁵等人及其他學者的支持。¹⁶儘管部分學者對於以 Fredrik

¹² Fredrik Barth 將族群視為人類群體組織的一種形式，認為在區辨不同的族群時，「邊界」(boundary)是一個更好的分析概念。正因為族群疆界是在不同族群互動關係中產生，族群疆界的主要特徵之一，即具有一種可變性。所謂的「邊界」是一種社會邊界，也是一種文化差異來維持的邊界。所謂的族群邊界，似乎是一種受許多客觀因素影響的主觀「異族意識」，也說明族群認同只存在於族群關係之中。如 Fredrik Barth 等學者所言，許多社會與經濟生態因素造成族群邊界，這種邊界以對內的根本感情連繫及對外的異族感來維持。鍾幼蘭：〈臺灣民間社會人群結合方式的構成與發展—以臺中縣神岡鄉大社村為例〉，《閩臺社會文化比較研究工作研討會論文集》(臺北：中研院民族所，1994 年)，頁 109-144；王明珂：〈漢族邊緣的羌族記憶與羌族本質〉，頁 155-159。

¹³ Leong Sow-Theng, *Migration and Ethnicity in Chinese History: Hakkas, Pengmin and their Neighbors* (臺北：南天書局，1998 年)。

¹⁴ 劉佐泉：〈客家源流〉，《客家歷史與傳統文化》(開封：河南大學出版社，2003 年)。

¹⁵ 陳支平認為，客家與非客家的南遷歷史相同，彼此交融頻繁，客家人的血統或南遷歷史不足以成為界定客家人的基本要素。界定客家應以方言及個人認同為據。客家在遷移的過程，由於向外發展產生的衝突，族群的自我意識變得必須且重要，漸以約定俗成的名詞，自稱客家。參見陳支平：《客家源流新論—誰是客家人》(臺北：臺原出版社，1998 年)，頁 145-156。

¹⁶ 趙以武亦認為「客家」之名產生於明清時期，最確鑿的時間在清初。可信的證明是，「客家」稱謂乃廣府本地居民泛稱大量湧入當地操語特殊的占籍移民，他們主要來自贛閩粵三省交界山區，因此，清初正式出現的「客家」稱謂，是討論「客家人」源頭的出發點。形成客家民系的時間，應早於清初，但上溯的斷限不能推究太遠，說是明代初期是合適的。參見趙以武：〈淺談客家研究中的幾個問題〉，《客家研究輯刊》，2000 年第 2 期，頁 30。劉勁峰則認為，當一種文化還處於封閉狀態，是不容易被意識

Barth 的族群邊界理論推斷客家形成於明清的說法持有質疑，¹⁷但若僅言文化共性之形成即可宣告客家之形成的說法，實未能全面觀照到該方言人群以「客」為名的形塑過程。因此，在文化共性形成的階段之後，必有第二階段的客方言群意識覺醒期，之後才可確定客家方言人群之形成。

二、客方言人群的形塑過程

「客」之成為一族群或民系稱謂，必先有一個與「客」相對的「土」。對於稱客方言人群為「客」的「土」之人群意涵，目前學界普遍有兩種看法。一是認為「土」是原居閩粵贛邊區的原住民，即畬族等少數民族。如宋光宇認為，從華南少數民族的用語習慣來看，「客」應是與「土」相對，歷史上畬族的漢化其實就是客家化，從畬族的漢化過程可透露客家名稱由來。然宋氏所言，「客」之名係得之於原住民之「土」，卻難以解釋對少數民族而言，自中原南下之漢人皆是客，何以只用於指稱客方言人群？雖然宋氏曾解釋，對於畬族而言，客家是對與其和平相處的漢人的稱號，多少

到，只有當此文化與不同文化接觸後，其文化價值及一致性方能體現，人們會主觀將自己的文化與其他文化區別，客家民系的自我意識才得以形成，此乃清中後期之事。參見劉勁峰：〈積累與嬗變—略論客家民系的形成過程〉，《客家研究輯刊》，2001年第1期，頁12-16。

¹⁷ 如謝重光認為，某一人群或種族集團是否形成一套共同社會和文化特點，只取決於是否有共同的經歷、環境和生產、生活方式，與是否和別的人群發生矛盾無關，與其他人群的矛盾，可以增強人群內部的向心力和凝聚力。例如福佬人是主要分布在福建泉州、漳州至廣東潮州一帶的一支漢族南方民系。福佬人與相鄰的客家、廣府人大量接觸並產生矛盾是較晚的事。福佬人此一名稱正式見諸文獻記載，約也是明以後。但不能依此認為福佬民系是明朝後才正式成立。早在唐宋時，福佬民系內部共同且有別於其他民系的社會、文化特點已形成，包括特殊的風習，較注重財富的追求，較濃郁的海洋色彩，閩南方言等。閩南方言的形成是六朝以來泉州土著與中原江淮移民長期交流的融合結果，其自唐中葉已初步形成，鞏固發展在北宋時期完成。如此，應該認為福佬人在唐宋時期已形成一套共同的社會和文化特點及價值觀念，不能認為是明代以後與其他人群發生矛盾後才形成。參見謝重光：《客家形成發展史綱》（廣州：華南理工大學出版社，2001年），頁172-177。

帶有親切、友善的意味，因此畚族未稱南下漳州的漢人為客家。¹⁸然而單以態度友善與否來區別「客」與「非客」，其理由實嫌單薄，且與客方言人群的形塑脈絡有所差異。

其實，針對與「客」相對的「土」，清嘉慶年間的徐旭曾，即已言明客係相對於粵之「土」而來，其所謂之「土」，係指先移住之其他漢民系，且以廣府民系為主，非如宋光宇認為之指原居當地的少數民族。

嘉慶年間掌惠州書院的徐旭曾所作之〈豐湖雜記〉，應是羅香林奠定其客家學研究開山祖師地位之前，最早對客家方言人群之來源、範圍、文化特徵有清楚論述者。由於東莞、博羅發生土客械鬥，徐旭曾乃召集門人，告以客人來源及其語言習俗所以不與其他漢人相同之因，而此亦被視為是一篇客家人宣言，甚或是客家民系形成的標誌。¹⁹此文中，呈現出客家方言人群的最初輪廓，對於了解中國歷史發展脈絡下的客家，有初步的還原作用。今摘其文如下：

今日之客人，其先乃宋之中原衣冠舊族，忠義之後也。……
迨元兵大舉南下，宋帝輾轉播遷，南來嶺表，不但故家世胄，即
百姓亦多舉族相隨，有由浙而閩，沿海至粵者，有由湘贛踰嶺至
粵者……殆如恆河數。……一因風俗語言之不同，而煙瘴潮濕，
又多生疾病，雅不欲與土人混處，欲擇距內省稍近之地而居之；
一因同屬患難餘生，不應東離西散，應同居一地也，聲氣既無間

¹⁸ 宋光宇：〈論客家原義〉，《客家文化研究通訊》，第4期（2001年12月），頁8-14。文中指出李藍在調查黔東南丹寨縣的漢語方言時，說當地苗族稱漢族為客家，漢語為客話。梁敏在談到廣西平話記時，亦言左江一帶和賓陽附近的壯族、瑤族人民也有稱平話為客話的。即湖南、貴州、廣西的少數民族（主要是苗、瑤、壯族），都有稱漢人為客家的習慣，漢人的語言因此被稱為客話。由此可見，客是對土而言，客是外來的意思，對少數民族而言，外來人的實體內容是漢人。即閩粵贛的客家之名應是得之於「畚族」稱外來的漢人為客家之習慣，與湘黔桂相同。宋光宇並指出，從華南少數民族的用語習慣觀之，客家原係泛稱，後來用以專稱閩粵的客家為客家，可能是人多族眾之故。

¹⁹ 嚴忠明：〈「豐湖雜記」與客家民系形成的標誌問題〉，《西南民族大學學報·人文社科版》，25卷9期（2004年9月），頁36-39。

隔，休戚始可相關，其忠義之心，可謂不因地而殊，不因時而異矣。當時元兵殘暴，所過成墟，粵之土人，亦爭向海濱各縣逃避，其閩、贛、湘、粵邊境，毗連千數百里之地，常有數十里無人煙者，於是遂相率遷居該地焉。西起大庾，東至閩汀，縱橫蜿蜒，山之南，山之北，皆屬之。即今之福建汀州各屬，江西之南安、贛州、寧都各屬，廣東之南雄、韶州、連州、惠州、嘉應各屬，及潮州之大埔、豐順，廣州之龍門各屬，是也。所居既定，各就其地，各治其事，披荊斬棘，築室墾田，種之植之，耕之穫之，興利除害，休養生息，曾幾何時，遂別成一種風氣矣。粵之土人，稱該地之人為客，該地之人亦自稱為客人。

客人語言，雖與內地各行省小有不同，而其讀書之音，則甚正，故初離鄉井，行經內地，隨處都可相通，惟與土人之風俗語言，至今猶未能強而同之，彼土人以吾之風俗語言，未能與彼同也，故仍稱吾為客人。客者對土而言，土與客之風俗語言不能同，則土自土，客自客，土其所土，客吾所客，恐再閱數百年，亦猶諸今日也。²⁰

由以上所言觀之，可知客方言人群的自覺，其實是源自於長期以來廣東省內廣、惠二屬土客之間，由於生存資源的爭奪，以及語言、文化、習俗間的差異所造成的衝突而產生的族群邊界。²¹其所論述之內容實已為日後羅香林客家研究基本定調，如強調客家乃中原衣冠舊族、語言為中原正音等。此外，值得注意的還有：(1)清中葉時的博羅、東莞地區，土客關係緊張；(2)在今日被視為是客家人的大本營的閩粵贛三省邊區，已有一方言人群出現，其先祖約在元代落居於今閩粵贛邊區；(3)該方言人群自視為「客人」，此時尚未見有「客家」自稱；(4)「客」之得名，實因別於

²⁰ 徐旭曾：〈豐湖雜記〉，收於《和平徐氏族譜》，羅香林：《客家史料匯篇》（臺北：南天書局，1992年），頁297-299。

²¹ 黃宇和：《兩廣總督葉名琛》（上海：世紀出版集團、上海書店出版社，2004年），頁3。

「粵之土人」，且經過一個由他稱而自稱的過程；(5)土客之別，在於彼此風俗語言之不同，「客者對土而言，土與客之風俗語言不能同」，方言分野明顯，以致「則土自土，客自客，土其所土，客吾所客，恐再閱數百年，亦猶諸今日也」；(6)其時已認為客之語言，近中原正音，關於此點，嘉慶年間的鄭昌時在所著《韓江聞見錄》一書中亦曾言及「其依山而居者，則說客話……而客音去正音為近」。²²由此，可以了解至少在清朝中葉的嘉慶年間，廣東省境內客方言人群已被明顯的區別出來。

值得注意的是，廣東長寧縣（今新豐縣）於明代建縣，²³當地方言有客家音與水源音兩種：

考長寧縣志云方言有二，一客家音，一水源音。相傳建邑時，

人自福建來此者為客家，自江右來土為水源。²⁴

此外，早在清初康熙年間，屈大均在所著《永安縣次志》中，言及在永安縣已有被稱為「客家」的一群人存在：

縣中雅多秀氓，其高曾祖父，多自江、閩、湖、惠諸縣遷徙

而至，名曰「客家」。此屋讀誦，勤會文。²⁵

凡此，多是他者對「客家」的認知，藉此可進一步了解，在徐旭曾以「客」自居的宣告之前，中國歷史上的確經歷過一段本地人以他者的身分對來自福建，或「江、閩、湖、惠」諸縣的移民以「客」稱之的時期。

由王明珂對羌族族群意識的研究可知，「羌族」原非一個族群的自稱族名，而是漢族給予他們的族名。由於地理上的阻隔，以及「溝」在人類經濟生態上的自足性，被稱作「羌族」的人群，在接受自己是「羌族」之前，似乎沒有一個含括全體的「族群認同」，也沒有一個共同的「自我族稱」。²⁶

²² 鄭昌時：《韓江聞見錄》（香港：香港潮州會館，1979年），頁172-173，卷10，「鄉音同異可通韻學說 備論潮音」。

²³ 吳松弟：《中國移民史》，第4卷，遼宋金元時期，頁3。

²⁴ 溫仲和：《嘉應州志》（臺北：成文出版社，1968年；1898年原刊），頁125。

²⁵ 屈大均：《永安縣次志》，收於《屈大均文集》（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96年），第6冊，卷14，風俗。

²⁶ 王明珂：〈漢族邊緣的羌族記憶與羌族本質〉，頁135。

與羌族相似是，客方言人群的族稱，亦經過一個由他稱而自稱的過程，且在未接受以「客」為族群自稱之前，亦未有含括閩粵贛全體的族群認同，充其量只能說是相毗鄰且類同的地域文化區。

在族群形塑的過程中，族名之建立有其重要意涵，對於客方言人群的形塑亦如此。族名可分為「自稱族名」和「他稱族名」。自稱族名經常是一個人群自我界定的最簡單而有效的判準，而且常與「人類」同義，以此劃定能分享族群利益的「人」群的範圍。而以「他稱族名」稱呼其他人群時，常帶有「非人類」或有卑賤的含意。²⁷離開原鄉流徙他地的客方言人群，在與移徙地先住族群互動或衝突過程中，初始亦常被以匪盜甚或非漢族視之。如崇禎《東莞縣志》中，即稱來居之閩、潮流人為「獠」：

邑之東北都抵惠陽，山原險曲，閩、潮流人多竄居之，以種藍為生，性多狠戾，號為**零**獠，所佃田地，復強霸不可御。²⁸

在這一段土客關係的日益緊張的過程中，由於在許多發生土客械鬥的地區，客方言人群主導方志書寫的能力尚未具備，因此在許多方志文獻中，客方言人群常被稱為匪、賊，或責以健訟凌主，如嘉慶《增城縣志》「客民」所載：

客民者，來增佃耕之民也。明季……時有英德、長寧人來佃於增，葺村落殘破者居之。未幾，永安、龍川等縣人亦稍稍至，清丈時，山稅者佔業浸廣。益引嘉應州屬縣人雜耕其間，所居成聚，而楊梅、綏福、金牛三都尤夥。

客民男女俱習田功，且耐勞苦，本亦可取。其見恨於人者，在佃耕之例。其例有長批，有短批。長批預定年限，或以為永遠為期。磽瘠之土，一經承佃，輒不惜工費，以漁利，而田主莫能取盈，轉佃他人，亦必先索其值，甚至佃經數易，田主仍有不知

²⁷ 王明珂：〈民族史的邊緣研究：一個史學與人類學的中介點〉，《新史學》，4卷2期（1993年6月），頁101。

²⁸ 葉覺邁修，陳伯陶纂：《東莞縣志》（臺北：成文出版社，1967年；1921年原刊），卷96，雜錄，頁3645。

者。短批腴壤居多，聽田主逐年招佃，然名為更招，仍不外原佃族黨，苟非其人則怙勢憑凌，爭訟隨之。至其歲納之租，其去成例，十常不及七八，田主之懦者，則其數更減，稅業被其隴斷，收息既微，不得已而賣他人，無敢售者，彼乃短勒其價而得之。此則土著所嗟嘆者也。

客民最健訟，其顛例甲乙，變亂黑白，幾於不可窮詰。大率客民與土人訟以糾黨合謀，客民與客民訟，亦分曹角勝，吏胥之積蠹，結為腹心，潮嘉之遊民，騰其刀筆，甚或抗拒符牒，挾持短長，一經天水復行，動至歲時淹久，非明決素著，鮮有不為所撓者。²⁹

光緒《四會縣志》則將客民附於獠之條略述：

邑上路各鋪多客民，土人稱之為客家，其來不知所自，雖習土音，而客家話久遠不改。初來時耕山移徙，亦類瑤瑯，久乃與土著雜居平壤，相親和睦，彼此無猜，故歲科試不另編客籍學額。近三十年前仍有陸續來僑居者。或曰客乃「疍」之訛。……此種客民幸際承平，孳生日盛，溪洞不能容，乃四散于各邑開荒，力作以謀生，久乃俗易風移，與齊民無異，理或然歟。³⁰

曾有學者指出，「客家」一詞是 17 世紀才出現，以前的地方志並未提及此名詞，後來的文獻則不僅出現「客家」，且常是「土客」並提，³¹造成此現象，實與明清時期人口流動的現象有關。明清時期，閩粵贛邊區人口飽和，加上清初遷海復界之後，大量客方言人群向粵東沿海或珠江三角洲一帶流徙，在互動的過程中，客方言人群的流寓與耕佃身分，漸與周邊的廣府或福佬方言人群面臨文化差異，以及現實的經濟資源的爭奪。乾嘉之後，流徙至廣府方言地帶的客方言人群，由於人口激增，勢力擴展，漸形

²⁹ 熊學源修，李寶中纂：《增城縣志》（臺北：成文出版社，1974 年；1820 年原刊），頁 227，「客民」。

³⁰ 光緒《四會縣志》，編一，獠疍·客民附。

³¹ 周振鶴、游汝杰：《方言與中國文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 年），頁 21。

成與土人相對競爭的局勢。如咸豐初年，郭嵩燾在調查肇慶各屬土客關係時，言及：

因查肇屬客民，原籍皆隸嘉應，其始墾山耕種，傭力為生，土民役使嚴急，仇怨日積。咸豐四年紅匪之亂，被擾二十餘州縣，紳民多被裹脅。客民應募充勇，因假公義以快其報復之私，所在慘殺，往往占據其田山產業，因以為利。嗣是土客互相殘害，各該州縣勸諭彈壓，屢和屢翻，垂六七年。³²

陳坤〈粵東剿匪紀略〉亦言：

恩平客民乃惠、潮、嘉三府州之人，雍正年間流寓廣肇二屬各州縣開墾住聚，自為村落，傭力營生，土民奴隸視之。³³

當時隨著客方言人群自閩粵贛邊區往南再次移民的過程中，在廣東珠江三角洲，乃至鄰近廣東的廣西邊區，均時有土客衝突的發生。根據傳教於廣東南部客家人之間的瑞典籍巴色會（Evangelische Missionsgesellschaft zu Basel）傳教士 Theodore Hamburg（韓山文）於 1854 年據洪仁玕口述所撰之〈太平天國起義記〉中，亦可了解，自嘉應州移住廣州府（花縣），及其再西移廣西的一群移民，不僅被廣州府的本地人稱為「客家」，亦被廣西人稱為「客家」。廣西的本地人與客家人之間關係不佳，且早在道光末年即在貴縣發生嚴重衝突：

秀全之祖先由嘉應州遷此（花縣），故族人均用嘉應州方言。本地人稱此等客籍民為「客家」……。賊匪多由廣東或鄰省而來，即廣西人所稱為客家者。廣西有客家村落甚多，但不若本地村落之強大。本地人與客家人之感情甚壞，互相仇視，一有事端發生，仇怨更深。……客家人與本地人未幾發生械鬥于貴縣境內，復有許多村鄉加入戰團。戰事起於八月二十八日（1850），其始客家佔勝利，因其人好勇鬥，成為習慣，而且大概兼有賊匪加入作戰。

³² 郭嵩燾：〈肇慶各屬土客一案派員馳往辦理情形疏〉，《郭嵩燾奏稿》，頁 24-25。

³³ 陳坤：〈粵東剿匪紀略〉，《四庫未收書輯刊》（北京：北京出版社，2000 年），第 3 輯第 13 冊。

但本地人愈戰愈強，經驗愈富，又以其人數較多數倍，卒將客家人擊敗，焚其屋宇，以故許多客家人無家可歸。在此患難中彼等央求拜上帝會教徒之庇護。……拜上帝會教徒多數為客家人，兇勇耐勞，因此以少數人敢向多逾數倍之本地人進攻，雖後者有官兵為助而仍常佔勝利。³⁴

兩廣地區土客衝突的最高點，應是自咸豐 4（1854）年開始的開平、恩平、新寧等縣的土客「分聲械鬥」，土客雙方互鬥十餘年，蔓延 5、6 縣，死亡百餘萬，此乃一場帶著地緣性質的方言群械鬥。械鬥先在鶴山、高明、開平、恩平等縣爆發，後延及台山。兩個不同方言群間的糾紛很快就從個別村落擴張為村與村、姓與姓的械鬥，最後甚至跨越了縣界。³⁵此次大規模的分聲械鬥直至同治 6 年，始由廣東巡撫蔣益澧議令土客聯和，另劃赤溪一廳，互易田地，紛爭始稍告解決。但由於赤溪貧瘠，難以解決客家人的土地問題，官方乃撥款 20 萬兩，加上地方自籌資金，分給客家成年者每人 8 兩，未成年者每人 4 兩，各戶發執照一份，讓他們至高州、雷州、欽州、廉州請領荒地開墾。於是大批客家人或循水路沿南流江和西江入桂，或沿陸路交通入桂。³⁶

綜上可知，清嘉慶年間徐旭曾對其惠州豐湖書院諸生所言，可視為因應長久以來土客緊張關係下客方言人群族群自覺意識的表現。而相較於如蠻、獠等非漢種的汙名指稱，移民歷史色彩鮮明的客方言人群，反而比較能夠接受帶有「外來的、遲來的、流寓性質」的「客」之他稱，以體現其「時時為客、處處為客」的長期遷移歷史。於是所謂的「客」乃由他稱而自稱，且進一步成為客方言人群自我認同的族群標誌。

³⁴ 洪仁玕述，Theodore Hamburg（韓山文）著，簡又文譯：〈太平天國起義記〉，收於王重民編：《太平天國（六）》（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 年），頁 837、868-869。

³⁵ 劉平：《被遺忘的戰爭—咸豐同治年間廣東土客大械鬥研究》（北京：商務印書館，2003 年）；何國強：《圍屋裡的宗族社會：廣東客家族群生計模式研究》，第 4 章，〈赤溪鎮：一個以半漁半農為主的粵中客家市鎮〉，頁 114-115。

³⁶ 王大魯修，賴際熙纂：《赤溪縣志》（臺北：成文出版社，1967 年；1920 年原刊），頁 50-51、164-171；劉平：《被遺忘的戰爭—咸豐同治年間廣東土客大械鬥研究》。

此外，客方言人群的自我覺由於起因於與不同人群間的互動與衝突，也因此在此衝突日激的過程中，藉由一些文化共性來加強自我認同。如光緒初年，有林達泉著《客說》：

楚南江閩、粵、滇、黔之間，聚族而居，有所謂客家者。其稱客，越疆無殊；其為語，易地如一。……客始產於北，繼僑於南，故謂之客也。客之對為主人。主人者，土人也。故今之言土客，猶世之言主客。主客之分，即土客之分也。……至其里居之硯瘠，則以土籍於先，客籍於後，先則擇肥而棄瘠，後則取其所棄而已足，無暇於擇。故土之占籍多平原沃野，食土之毛而已，充然有餘。客之村落，依山倚壑，男女皆耕織，無敢自惰。又種竹樹以為樵販，無不盡之地利。其壯者則多傭力四方，以營於衣食。蓋當客之初來，其膏腴盡為土人所墾，故有司即土人之所棄，若深林叢箐，狐狸之所居，豺狼之所嗥，俾客群聚州處，披荊斬荊，以自贍給。故客勤而卒苦於貧，土逸而恆溺於富，此先後之異也。間嘗按之史冊，詳為稽核，客之源流，殆託始於漢季，盛於東晉六朝，而極以南宋。何以明之，客之先皆北產也，居豐鎬河洛齊魯之交，或為帝王之胄，或為侯伯之裔，或為耕鑿之民，皆涵濡沐浴於禮樂詩書之澤，數千百年，自漢中平以還，中原雲擾，孫氏父子割據江表九郡八十一州之地，能招集賢能，北方之士多依以成名，而客於是乎濫觴焉。遞於東晉元嘉五胡亂華，冠帶數千里之區，腥膻塞路，於是乎豪傑之徒，相與挈家渡江，匡扶王室。……土客鬥奈何指客為匪。嗚乎，客自漢以來千有餘年，祖孫父子與土人並列編氓，土客之名有殊，而自朝廷觀之，胥著籍之民也。客與土鬥，客非與官仇，世之有司，聽土人之誣捏，遂因械鬥而目以叛逆，竟助土人而驅之，滅之，必使無俾易種於斯土也。嗚呼，何不溯其所由來也。故為之說，以俟哀矜者之平，

其情解其怨焉。³⁷

自此文中可以了解當時客方言人群處境之艱困。由於後土而至，不僅只能依山倚壑，無敢自脩，甚被土民指為匪，官方亦視「客」為叛逆，且加以驅逐之。面對如此局勢，客族士人仍積極證明客乃中原土族之後、勤耕之民。

再者，黃遵憲著〈梅水詩傳序〉亦言：

嘉應一州，占籍者十之九為客人，此客人者，來自河洛，由閩入粵，傳世三十，歷年七百而守其語言不少變，有方言廣雅之字訓詁家失其義，而客人猶識古義者，有沈約劉淵之韻詞章家誤其音而客人猶存音者，乃至市井詬誶之聲，兒女噢咻之語，考其由來，無不可筆之於書。余聞之陳蘭甫先生謂，客人語言證之周德清中原音韻無不合，余嘗以為客人者，中原之舊族，三代之遺民，蓋考之於語言文字，益自信其不誣也。³⁸

清光緒年間溫仲和著《嘉應州志·方言》：

嘉應州及所屬興寧、長樂、平遠、鎮平四縣，并潮州府屬之大埔、豐順二縣，惠州府屬之永安、龍川、河源、連平、長寧、和平、歸善、博羅一州七縣，其土音大致皆可相通，然各因水土之異，聲音高下亦隨之而變，其間稱謂亦多所異同焉。廣州之人謂以上各州縣人為客家，謂其話為客話。由以上各州縣人遷移他州縣者，所在多有。大江以南各省皆占籍焉。而兩廣為最多。土著皆以客稱之，以其皆客話也。大埔林太僕達泉著客說，謂客家多中原衣冠之遺，或避漢末之亂，或隨東晉南宋渡江而來，凡膏腴之地，先為土著占據，故客家所居地，多瘠瘠，其語言多合中

³⁷ 林達泉：〈客說〉，《林太僕文鈔》卷上，收於溫廷敬輯：《茶陽三家文鈔》（臺北：文海出版社，1967年），頁133-135。

³⁸ 黃遵憲：〈梅水詩傳序〉，收於張煜南：《梅水詩傳》（臺北：張穎基，1973年；1901年原刊）。

原之音韻，其說皆有所考據。³⁹

清人羅翹雲在所著《客方言》的自序言：

夫客之先自中原轉徙而來，凡土田肥美之鄉，水陸交通之會，皆先為土著占據，故所居多在山僻陵谷，隔絕山川間阻，保守之力因之益強。語音不變，此為太原矣。⁴⁰

凡此，皆可視為自徐旭曾闡述客之源流後，客方言人群中的文人代表，以客家方言及中原血統為客方言人群正名之作。張應斌、謝友祥兩人曾就黃遵憲（1848-1905）所著《已亥雜詩》及相關文集探索黃遵憲的客家源流觀，認為黃遵憲客家史觀的核心有二，即中州舊族說與梅州客家元代形成說。且由黃遵憲的相關詩文中，可以看出當時「客家」稱謂尚未流行，多自稱「客人」、「客民」。據不完全的統計，黃遵憲的詩文中，「客人」凡十六見，「客民」凡四見，但沒有一例稱「客家」者。⁴¹

文獻中客方言人群自我形塑的過程中，除了表明客之由他稱而自稱的過程，更多心力在建構一套族群的文化共性，如強調中原血統，強調共同風俗，乃至標榜客方言。而這也是當時土客相爭的過程中，當嶺南地區的其他民系「以言語異廣東諸縣，常分主客，褊心者或鄙夷之，以為蠻俚，播之書史，自清末以來，二、三十年之中，其爭益劇」⁴²的歷史背景下，被視匪、賊，或蠻、獠等非漢族的客方言人群，藉由將自己與中原漢文化之間建立起正宗的聯繫，建構客家民系所有成員認同的歷史象徵，以證明客家是漢民族的一個支系。即在普遍視客家為蠻夷的大環境中，客方言人群很自然地將「中原舊族說」視為反擊的法寶。因此當嘉應州文人走出原籍地後，在異地文化參照和啟發下，了解客家方言是可證明客家是中原舊

³⁹ 溫仲和：《嘉應州志》，卷7，頁121-122。

⁴⁰ 羅翹雲：〈客方言自序〉，《客方言》（臺北：古亭書屋，1972年；1922年原刊），頁17。

⁴¹ 文中認為《已亥雜詩》89首中，有13首涉及客家文化，3首涉及客家史觀。參見張應斌、謝友祥：〈黃遵憲的客家源流觀〉，《汕頭大學學報（人文科學版）》，16卷4期（2000年），頁78。

⁴² 章太炎：〈客方言序〉，收於羅翹雲：《客方言》，頁5。

族的有力工具之後，⁴³客家方言的強調與研究就成為客方言人群自我保護的盾牌，及內部凝聚共識的族源根據。因此，光緒溫仲和《嘉應州志·方言》、羅翹雲《客方言》等之強調客方言為中原正音的研究篇章，皆是在這樣的歷史情境下所產生的，族群自我識別的性質濃厚。於是，客方言人群形塑的過程至今，從了解土客之別，決定以客自居，更進而強調中原血流與中原正音以做為對外宣誓、對內凝聚的族群標誌，即如章太炎序羅翹雲所著《客方言》10卷時所言「蓋自是客語大朗，而客籍之民，亦可介以自重矣」。⁴⁴

三、羅香林的客家再形塑

如前所述，由於原居閩粵贛邊區的客方言人群的南下流徙，使之錯落散居於不同語群與文化的廣府民系之中，兩種不同方言人群接觸之後，彼此文化的隔閡，加上現實資源利益的爭奪，土客關係日益惡化，至遲到了清中葉，客方言人群已有族群自覺，初時自稱客人、客話，之後方有「客家」之自稱。客方言人群的族群意識起於被汙名化的過程，是以選擇標榜中原血統，強調其中州正音，對抗當時其他族群所賦予的非漢蔑稱。客家族群意識形成於受辱的過程，直至清末民初一仍如此，而這也是羅香林客家學產生的環境因素。⁴⁵

⁴³ 張應斌、謝友祥：〈黃遵憲的客家源流觀〉，頁 77-84。

⁴⁴ 章太炎：〈客方言序〉，頁 6。

⁴⁵ 羅香林曾將所謂的客家問題轟動學界的過程，分為四個時期，其實即為一波接著一波客家遭受汙名化，而後反汙名化的過程。第一期為自洪楊起義及西路門案二事件發生以後，至光緒 30（1904）年。此期有許多外籍人士研究客家源流或客語，林達泉著《客說》、溫仲和於《嘉應州志》闢方言一編，黃遵憲述客之源流亦皆出於此期；第二期自光緒 31 年至民國 8 年（1905-1919），其發端於順德人黃節於上海國學保存會出版《廣東鄉土歷史》，其中據上海徐家匯教堂所編《中國地輿志》，謂「廣東種族有曰客家福佬二族，非粵種，亦非漢種」。客家人士對此大為不滿，乃聯絡南、韶、連、惠、潮、嘉各屬客人，設「客家源流研究會」，嘉應勸學所復發起「客族源流調查會」，當時主其事者有丘逢甲、黃遵憲、鍾用錡等人。第三期自 1920 至 1930 年，發端於上海商務印書館出版西人烏耳葛德編的英文世界地理，於廣東條下，謂「其山地多野蠻

在羅香林於 1933 年通過其學術著作《客家研究導論》，將客家作為一個民系範疇正式系統地提出之前，客方言群的知識分子即已積極透過志書之撰寫為客方言人群正名，也藉以凝聚我群之認同。因此，無論是光緒末年出版的《興寧縣鄉土志》、1917 年興寧人羅翹雲主持志局、賴際熙總纂《增城縣志》與《赤溪縣志》、民國新修《大埔縣志》等，乃至 1932 年，鄒魯接掌廣東中山大學校長並兼任通志館館長，均可見清末民初之際，客家學者十分熱衷於編修志書，此正顯示出他們嘗試用各種方式建構強而有力的客家論述，不斷試著從方言、種族、文化風俗來捍衛象徵「客家」的固有價值，藉以駁斥過去對客家方言、蠻夷民族與風俗習尚的誤解。⁴⁶

在羅香林以前與客家相關的論述，多始終停留在族群身分的辨析，羅香林則將爭議提昇至學術層面。然而其對客家問題的研究，仍是相應於紛亂的時局而生，其研究的發端亦仍源於族群意識的自覺，凡此，均導致其日後關於客家研究的討論，始終難擺脫族群情結的糾葛。羅香林客家自我認同意識之強調，實亦形成其客家研究的盲點。⁴⁷

羅香林的客家學研究，一如以往，亦追溯中原正統，強調客家方言與族譜。他認為民系之形成基於外緣、天截、內演三種作用，以此，認為客家民系之成形始於宋代。⁴⁸針對羅香林將客家形成之前的祖先以「客家先

的部落，退化的人民，如客家等便是」。相應於此，客屬人士乃組織客系大同會的組織，主其事者，為饒芙裳、姚雨平、周輝甫、黃鍊百諸人，及在滬留學的人士。不久汕頭有專以宣揚客家文化為目標的《大同日報》出版，1924 年，復有香港《崇正同人系譜》的纂輯。第四期則始自 1930 年 7 月，廣東省府建設廳編《建設週報》第 37 期，一篇關於客家風俗的短文，謂「吾粵客人，各屬皆有，……分大種小種二類；大種語言啁啾，不甚開化，小種則語言文化，取法本地人」。經客人抗議後，始由省府主席陳銘樞幾經調處，始以降調週報編者，並更正內容及道歉後，紛爭方息。同年冬，有梅人古直出版《客人對》。參見羅香林：《客家研究導論》（臺北：南天書局，1992 年），頁 5-10。

⁴⁶ 唐立宗：〈敬恭桑梓：近代廣東志書的編纂活動與「客家」途述〉，「第二屆客家研究研究生論文研討會」（2002 年），頁 83-118；唐立宗：〈清代廣東方志的「客民」、「客匪」與「客家」論述〉，「第四屆青年學者論壇」（北京，2005 年），頁 93-107。

⁴⁷ 賴旭貞：〈佳冬村落之宗族與祭祀—臺灣客家社會個案研究〉，中正大學歷史所碩士論文，1999 年，頁 10-12。

⁴⁸ 羅香林：《客家研究導論》，頁 67-72。

民」稱之，且正式揭櫫提出所謂的客家的五次遷移說，⁴⁹明確地描敘出客家先民自中原南遷華南各地的移住路線，瀨川昌久認為羅香林此種立論，其實隱含「客家」在歷史上是自黃巢倡亂後一直存在的人群實體之意。⁵⁰羅香林有意暗示客家早在宋代之前即已隱約成形的想法，除表現在五次遷徙說之外，亦可在其將溫仲和所提之客戶說溯源自晉代「給客制度」中略窺一二。

羅香林所提客家民系形成於宋代，其論點主要是呼應溫仲和在《嘉應州志》所提之客戶說。溫仲和的《嘉應州志》中，曾載：

主客之名疑始於宋初戶口冊。故寰宇記九域志所載，戶皆分主客，而唐元和郡縣志載，開元元和之戶皆無主客之分，其後屢經喪亂，主愈弱客愈強，至於元初，大抵無慮皆客。元史所載，亦不分主客，疑其時客家之名已成無主之非客矣。⁵¹

以上所謂客家源於客戶說，已有學者加以駁斥，因為，究其實，所謂宋代的主客戶之別，在於有無田產及有無向政府納稅服役。客戶係指無地的佃農，依附於主戶，與官府無直接關係，沒有田產也不繳納兩稅，亦稱「無稅戶」。且《晉書·王恂傳》「魏民給公卿已下租牛客戶，數各有差」，說明客戶之稱並不始於宋代，且是全國性的，與客家民系毫無關係。因此，用客戶之稱來論定客家是在宋代形成是不當的。把客家和客戶混為一談，

⁴⁹ 羅香林認為客家先民的南徙，以東晉南渡為始機。自東晉至隋唐，可說是客家先民自北南徙的第一時期，大抵皆循潁、汝、淮諸水流域，向南行動。第二時期的遷徙起因於唐末黃巢的造反，此次遷徙遠者由今河南光山、潢川、固始、安徽壽縣、阜陽等地渡江入贛，近者逕自贛北或贛中，徙於贛南或閩南、粵北邊地。第三時期，由於宋高南渡，元人進迫，此時期移民方向多自贛南、閩南徙於粵東、粵北，至元末，廣東東部、北部，客家移民的住地，政府已無法將主客戶分別立冊。可知廣東的客家，大半實自宋末到明初才興盛起來。第四時期的遷移，則以內部人口的膨脹為主因，多自粵東、粵北徙於粵省中部、四川東部中部，廣西蒼梧、柳江所屬各縣、臺灣彰化、諸羅、鳳山諸縣，或自贛南徙於贛西。第五期自同治六年至今，多自粵省中部東部，徙於高、雷、欽、廉各地，或更徙至海南。參見羅香林：《客家研究導論》，頁 49-64。

⁵⁰ 瀨川昌久：《客家：華南漢族のエスニシティ—とその境界》（東京都：株式會社風響社，1993 年），頁 31。

⁵¹ 溫仲和：《嘉應州志》，卷 7，頁 121-122。

可說是犯了一個知識性的錯誤。⁵²

《嘉應州志》以宋之客戶為客家之來源已是見樹不見林的偏差，而羅香林在《客家源流考》一書中又把「客戶」從宋代前推至晉元帝「給客制度」的詔書。認為客家的「客」字是沿襲晉元帝詔書所定，至唐宋，政府簿籍，乃有「客戶」專稱，客家一詞，則是民間通稱。羅香林將客家與晉代的給客制度扯上關係的說法，多少有些為客家溯源而無限上綱之嫌。其實，早在溫仲和之前，徐旭曾即已言明廣東客人約係元代移至，黃遵憲諸多論及客族源流的詩文中，亦明顯可見其主張梅州客家元代形成說。凡此，與吳松弟依據《客家資料匯編》、《寧化客家研究》等書及所採集之族譜資料所作之分析相去不遠。由其統計中可看出南宋末、宋元間、元代等期間內遷入廣東的家族，占全部的 46.3%，可知所謂的客家先民主要是在宋元之際和元代此一期間遷入廣東，即這些氏族對廣東客家形成和發展產生重大作用。⁵³

客家形成時間的不斷上推或強調血統之純正，其實也是對一直以來加諸於客方言人群汙名化的一種反擊，卻也因此模糊了客家方言人群在歷史中形塑的真正過程，造成文獻上之「客」與客方言人群間種種似是而非的糾纏。於是，自羅香林之後，許多文獻上書寫的「客」常被懷疑或被認為是客方言人群的歷史陳跡。

四、史籍中之「客」與「客家」

在大致了解客方言人群的形塑過程後，接下來應進一步探討史籍中的「客」與客方言人群的關係。「客」在中國文字上有其原本客觀意涵，即有「晚至」、「外來」之意。反應在明清時期的移民史上，「客民」、「客籍」又常帶有流寓、耕佃之意。明清時期客方言人群在流徙新居地時，常被當地

⁵² 蔣炳釗：〈試論客家的形成及其與畬族的關係〉，頁 285；陳智勇：《中國古代社會治安管理史》（鄭州：鄭州大學出版社，2003 年），頁 185-186。

⁵³ 吳松弟：《中國移民史》，第 4 卷，遼宋金元時期，頁 188。

的先住民，無論是贛省土著或廣東廣府人、潮汕人以「客民」、「客籍」、「客人」稱之，此乃因明末清初以來，閩粵贛邊區客方言人群的向外遷徙是當代中國移民史上的主要人口流動，在各移入區均有土客之爭，如江西、四川、廣東（廣州）、廣西等。

從明清時期人口流動的大趨勢看來，史籍上的「客戶」⁵⁴或「客籍」，與客方言人群存在一定的關連性，即「客民」很有可能是客家，但卻並不能以「客民」或史籍上以「客」為名者，皆直指客家。⁵⁵試舉一二例說明之，如乾隆 25 年上諭言當時的烏魯木齊：

……闢展各處，知屯政方興，客民已源源前往貿易，茆擔土銚，各成聚落，將來阡陌日增，樹藝日廣，則甘肅等處無業貧民前赴營生耕作，污萊闢而就食多，于國家牧民本圖大有裨益。⁵⁶

再者，嘉慶年間的貴州省：

黔省固多客民，興義府尤其淵藪。自嘉慶年間平定苗匪之後，地曠人稀，每有黔省下游及四川客民及本省遵義、思南等處之人，仍多搬住，終歲不絕，亦嘗出示飭屬禁而不能止。⁵⁷

以上所言之「客民」，皆係指外來流徙之民，與客方言人群之「客」毫無干係。此種土、客籍的分殊在邊疆少數民族地區十分普遍，因此乾隆 59（1794）年貴州苗民起義時便提出了「焚殺客民，奪回田地」的口號。⁵⁸

此外，許懷林在〈棚民·客籍·客家意識—義寧州客家的歷史實際〉一文中，亦發現明清之際，贛西北先住民對閩粵遷來居民，多稱之為「客民」、「客籍」，但均非意指作為漢族一民系之一的客家。在贛西北，無論官府或民間，均未使用「客家」名稱，只有「棚民」、「客民」、「客籍」，不含

⁵⁴ 作為附籍、寄籍性質的「客民」、「客戶」在中國歷史上很早就出現，如柳芳《食貨志》中說「人逃役者多浮寄圩閭里，縣收其名，謂之客戶」，參見《全唐文》，卷 372。

⁵⁵ 蔣炳釗：〈試論客家的形成及其與畬族的關係〉，頁 285。

⁵⁶ 《清高宗實錄》，卷 612，乾隆 25 年 5 月壬子。

⁵⁷ 賀長齡：〈復奏漢苗土司各情形折〉，《耐庵奏議存稿》，卷 5。

⁵⁸ 張世明、龔勝泉：〈另類社會空間：中國邊疆移民社會主要特殊性透視（1644-1949）〉，《中國邊疆史地研究》，2006 年第 1 期，頁 78-88。

民族民系的差別。客民係相對於土著而言，泛指外地遷來者。客籍則是贛西北土著對已落籍本地的外來的閩粵移民的稱呼。作者並指出，如今我們認定這群客民、客籍為客家，但必須指出當時他們沒有自稱為客家，而是接受客籍的名號，即客家意識對這群移民而言是非常淡薄的。⁵⁹

再者，我們必須了解的是，客家話成為現代客家方言的專稱，是近代百數年間的事。是以，相關文獻、典籍上所提之「客語」不一定指現代的客家方言，即文獻上的「客」用以形容某種方言，其實亦有其因時因地演變的歷史脈絡，與後來被定義為客家族群所使用的方言毫不相涉。⁶⁰如《天下郡國利病書》引《太平寰宇記》記述粵西雷州一帶的族群與方言：

俗有四民，一曰客戶，居城郭，解漢音，業商賈；二曰東人，雜處鄉村，解閩語，樂耕種；三曰深，居遠村，不解漢語，惟耕墾為活；四曰蜚戶，舟居穴處，亦能漢音，以採海為生。⁶¹

.....

語音州城惟正語，村落語有數種：一曰東語，又名客語，似閩音；一曰西江黎語，即廣西梧、潯等處音；一曰土軍語，一曰地黎語，乃本土音也。其儋崖及生黎與蜚、瑤番等人，語又各不同，或間雜胡語。⁶²

文中解漢音之「客戶」，應是五代時從中原、北方遷徙來的移民。而「客語」又名「東語」，實係閩音，並非後來所認知的客方言。海南島的《感恩縣志》載「感語有三種：曰軍語、客語、黎語。軍語與正音相通，客語似閩音，瓊屬最多此語」，可知此之客語指屬於閩方言的海南話。《崖州志》

⁵⁹ 許懷林：〈棚民·客籍·客家意識—義寧州客家的歷史實際〉，《嘉應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18卷2期（2000年4月），頁100-101。此外，趙以武在〈淺談客家研究中的幾個問題〉一文中亦言，史籍所見的「客」、「蔭客」、「客戶」等專用語，並非指「客家」，概念上絕不是一回事。趙以武：〈淺談客家研究中的幾個問題〉，頁29-31。

⁶⁰ 李新魁：《廣東的方言》（韶關：廣東人民出版社，1994年），頁475。

⁶¹ 顧炎武：《天下郡國利病書》7（臺北：四庫善本叢書館，1959年，四部叢刊三編史部），廣東，頁49。

⁶² 顧炎武：《天下郡國利病書》7，廣東，頁68。

亦有相同說法，「曰客語，與閩音相似」。⁶³

「客語」除了曾被認知為近閩音外，在廣東電白，由於最早來此的是操閩方言系統（今稱黎話、海話）來自潮汕、福建的移民，在當地形成狹長閩方言帶。即電白境內先有閩方言民系，次有客方言民系，粵方言民系最晚。由於粵方言民系最遲來到，所以成為「客」，其語言為「客話」。「客話」指粵方言，⁶⁴此例雖極罕見，亦可聊備一說。

總之，在明清方志中，「客民」、「客籍」、「客語」、「客話」之書，不及備載，史籍或文獻上的「客」應還其在中國移民史上的原來面貌。此外，客方言人群的形塑有其歷史背景，加上由於反汙名化後的族群自我識別意識在此過程中發揮主要凝聚動力，因此，現今的客家相關研究當中，若欲自文獻尋找客方言人群的身影，必須小心斟酌，審慎地回歸歷史原本的脈絡，而非見獵心喜，見「客」即認為是客方言人群的歷史過往。此一態度，不僅在處理中國華南客家民系的源流，及其與各民系間的關係時需要如此，在處理清代臺灣漢人族群關係時更復如此。

叁、清代臺灣史志中的客與客家

本節的主要重點，在接續以上從客方言人群在歷史上的形塑過程中，檢討華南地區史籍記載的「客」與客方言人群間的實際關係的基礎上，進一步了解清代臺灣史志中「客」之書寫與客方言人群間的關係。因此，本節將先針對清代臺灣史志中「客」之意涵加以分析，後再試著將之與華南地區的情形相較，希望能以此為出發點，釐清以往將清代臺灣文獻上之「客」或「粵」逕指為客方言人群的可能誤解。

一、清代臺灣史志中的「客」

⁶³ 李新魁：《廣東的方言》（韶關：廣東人民出版社，1994年10月）。

⁶⁴ 黃淑聘：《廣東族群與區域文化研究》（廣州：廣東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年），頁95。

如今對清代臺灣「客蹤」之追索，普遍有兩種識別方法：一是將志書等文獻上「客」之書寫抽離文獻原本應有的脈絡與意義，使其成為清代臺灣客家研究最重要的材料來源。⁶⁵甚至有學者認為，文獻上的「客」即是指客方言人群，而非「客籍」之意。⁶⁶二是逕將文獻上的「粵」籍漢人等同於「客家」，因此清代文獻上常見的「閩粵械鬥」，很自然地被詮釋為客家與福佬兩個不同方言人群的衝突。基於以上兩種認知，文獻書寫中的「客」與「粵」就成為建構清代臺灣客方言人群史的主要素材。

然而，清代臺灣相關文獻中所書寫之「客」到底有何意涵，是否真能等同於我們今日所認知的客方言人群？大陸學者劉麗川在分析清代粵臺兩地客民稱謂異同時，認為清代臺灣典籍中「客」在指稱上兼有二重性，其中「山客」、「客仔」或「客子」和「客人」等是專門指稱客語族群。因為「渡臺的粵人主要就是客家人」，且其之所以被稱為「客」，是由於閩人先於粵人入臺，乃稱之。其餘的，行文中須依上下文意來確認其所指。並指出在終清一朝的臺灣典籍中均不曾見有「客家」一詞的記載。⁶⁷然而，其卻未指出何以證明「渡臺的粵人主要就是客家人」，而且清代臺灣文獻中的「客」是否真出於閩先粵後之別，也需進一步釐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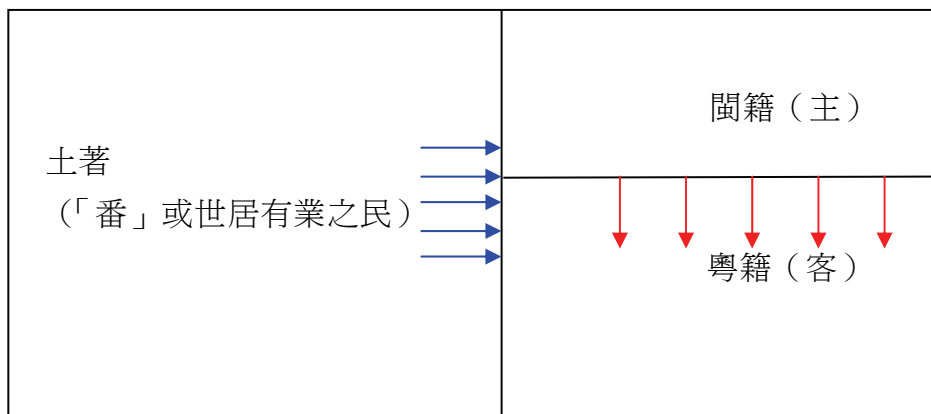
若就已知的文獻資料加以歸納分析，清代臺灣史志中的「客」，其所指涉的人群內涵的確可以分為兩個不同的層次來說明。第一層次中，「客」係指別於土著，故閩粵皆「客」；第二層次則是別於土著皆為客之閩粵移民中，復因省籍不同而分別出閩主粵客。但其中專用以指稱粵東移民的「客」卻未必是客方言人群。茲略析如下。

⁶⁵ 李文良：〈清初臺灣方志的「客家」書寫與社會相〉，《臺大歷史學報》，第31期（2003年6月）。

⁶⁶ 尹章義：〈臺灣移民開發史上與客家人相關的幾個問題〉，《中國海洋發展史論文集(四)》（臺北：中研院三民主義研究所，1991年），頁280-281。

⁶⁷ 劉麗川：〈論清代粵臺兩地客民稱謂之異同〉，《深圳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1卷2期（2004年3月），頁99-103。

圖 1：清代臺灣史志中「客」之人群意涵示意圖



首先，就別於「土著」之「客」而言。觀諸清代臺灣相關文獻中，其別於「客」之「土著」，有兩種不同的人群意涵。一是指臺地的原住民，其次則是指已在臺地落籍定居，有田廬家室者。據悉，「土著」一詞，在中國史書典籍中，原本是用作描述少數民族，指其定居且農耕的生存狀態與生活方式。至後期方漸演變成今日廣泛認知之相對於「浮寄」、「客籍」之「世居本地之人」之意。⁶⁸而此兩種對「土著」的詮釋，在清代臺灣史志中皆可見相關事例。

將「土著」視為臺地原住民的情形（參表 1），如清領臺之初，擔任諸羅知縣的季麒光即曾說「臺灣，海中小島，……土番其土著也」。⁶⁹康熙 36（1697）年為採礦事走訪臺地的郁永河亦曾言「臺之民，土著者是為土番，言語不與中國通」；⁷⁰「諸羅、鳳山無民，所隸皆土著番人。番有土番、野番之別」。⁷¹文獻中在提及番與客民的關係時，則有「番地番田，皆為客民所占」、「生番居十之六，餘皆客民」、「臺東本番地，土著皆番人；……客民則閩、粵人」等記載。

⁶⁸ 賈叢江：〈釋「土著」〉，《西域研究》，2005 年第 4 期，頁 106。

⁶⁹ 季麒光：〈條陳臺灣事宜文〉，收於陳文達：《臺灣縣志》（文叢第 103 種，1961 年；1720 年原刊），藝文志十·公移，頁 227。

⁷⁰ 郁永河：《裨海紀遊》（文叢第 44 種，1959 年），頁 9。

⁷¹ 郁永河：《裨海紀遊》，頁 32。

表 1：指「番」為「土著」之史料舉隅

引	文	內	容	出	處	原刊時間
	臺灣初入版籍，土著之民惟知耕獵；奸胥猾弁，往往侵之。			清耆獻類徵選編，頁 640/朱宏祚。		1692?
	臺盡番地也……以臺地土庶，盡閩之漳泉、粵之惠潮，無長子孫以世居者；諸番迺土著之民，其令有司撫恤之。			臺海使槎錄，頁 94/番俗六考。		1722
	臺灣生番，性雖蠻野，卻極馴順……何可擯絕不受，坐視客民強佔虐使，留為肇之端？			左文襄公奏牘，頁 13/籌辦臺灣吏事兵事請責成新調鎮道經理摺（同治 5 年 10 月初 5 日）。		1866
	臺中番社，徭役最繁，官有調發，彼無不從。且聞近歲以來，番地番田，皆為客民所占，艱難固苦，無以自存，竊思均為赤子，豈可獨令向隅？是番民當加之撫卹也。			福建通志臺灣府，頁 818/國朝儒林傳/福州府閩縣。		1871
	本部堂查臺灣全地，久隸我國版圖。雖其土著有生熟番之別，然同為食毛踐土已二百餘年，猶之粵、楚、雲、貴邊界猺、獯、苗、黎之屬，皆古所謂我中國荒服羈縻之地也。			甲戌公牘鈔存，頁 43/閩浙總督李照會日本國中將並劄行臺灣道。		1874
	臺地向分閩、粵二籍，考試各童，閩八粵二，番籍雖係土著，應考無多。			劉壯肅公奏議，頁 300/恭報南北考試完竣摺（15 年 5 月 21 日）。		1889
	案恆邑莊民，均係閩之漳、泉，粵之潮、嘉等處渡海而來；最久者，亦不過三、四世。開治以後，來者較多，土著則皆番民也。			《恆春縣志》（文叢第 75 種），頁 129/戶口（民番）。		1893
	李云：生番居十之六，餘皆客民。貴大臣提及臺灣，想遂有往踞之心；不願停戰者，因此？但英國將不甘心，前所言恐損他國權利，正指此耳。臺灣不守，則又如何？			馬關議和中之伊李問答，頁 17/問答節略。		1895
	臺無土著。土著者，熟番與生番而已。其民人五方雜處，漳、泉流寓者為多，廣東之嘉應、潮州次之，餘若福建之興化府、福州府，全臺合計兩府之人流寓臺地者，不過萬人而已。外此，更寥寥無幾焉。			安平縣雜記，頁 23/住民生活。		1895-?
	臺東本番地，土著皆番人；以居平地，稱「平埔番」。客民則閩、粵人，自前山來者居多；北路，則宜蘭人居多。			臺東州采訪冊，頁 49/風俗（附番語）。		1896

其實，清代臺灣史志中之「土著」，用以指稱臺地原住民者的情形占相對少數。清朝政府對於臺灣住民的分類，常是將「番」別於「民」之外，⁷²史志中的「土著」較多用於「民」的範疇，指稱「有室、有家，父而子、子而孫」、⁷³「其來既久，農服先疇，賈有世業；有田可耕，有貨可貿，室家既寧，邱墓在是」之民。⁷⁴然而清領臺之初，由於甫經戰亂，加上住民多已被迫內徙，因此實處於「素無土著」、「土著鮮少」、「民非土著」（參見表 2），而成為閩粵移民墾殖的新天地。

表 2：指臺地「素無土著」、「土著鮮少」之史料舉隅

引	文	內	容	出	處	原刊時間
	臺灣自紅彝僭竊以來，因仍草昧，鄭氏父子相繼，民非土著，逋逃之淵藪，五方所雜處，未盡同風而易俗。			臺灣府志，頁 91/風俗（附土番）。		1696
	土著既鮮，流寓者無期功強近之親，同鄉井如骨肉矣。			諸羅縣志，頁 145/風俗志/漢俗/雜俗。		1717
	臺民素無土著，皆內地作奸逋逃之輩，群聚閭處，半閩、半粵。			平臺紀略，頁 67/經理臺灣疏。		1724?
	閩浙總督調任兩廣那蘇圖奏：「……臺灣一府孤懸海外，並無土著，半屬游惰……。」			清高宗實錄選輯，頁 38/乾隆 9 年。		1744
	而四民雜處，無土著。			使署閒情，頁 101/董夢龍/臺灣風土論。		1746
	本無土著，浮槎泛梗而至，漳、泉、潮、惠為多。番與民、閩與粵，性習又各岐。			使署閒情，頁 118/褚祿/「重修臺灣府志」跋。		1746
	四十年來，休養生息，衍沃富饒。顧土著鮮			重修臺灣府志，頁 663/蔡世遠		1746

⁷² 楊聰榮曾指出，清政府對治下人群的分類，第一層次是原漢關係，第二層次才是漢民的地緣祖籍關係。因此如《安平縣雜記》的記述中，會在「生番即其土著」之前加上「臺灣本無土著」，表示其「民」的概念是將「番」排除在外的。參見楊聰榮：〈從族群關係史看臺灣客家的分類範疇與獨特性〉。

⁷³ 高拱乾：《臺灣府志》（文叢第 65 種，1960 年；1696 年原刊），頁 186，風土志/漢人風俗。

⁷⁴ 謝金鑾：《續修臺灣縣志》（文叢第 140 種，1962 年；1831 年原刊），頁 144，政志/論曰。

少；火耨草闢，多閩、粵無賴子弟；地廣則易以叢奸，民雜則易以召亂。	/安海詩序。	
臺灣孤懸海外，為東南四省藩籬；番、漢雜處，民無土著，率皆粵之潮惠、閩之漳泉游手好閒之流偷渡來臺，各分黨羽，好利輕生。	清耆獻類徵選編，頁 824/白瀛。	1747
……該地流寓，而土著少。流寓之人俱係粵東惠潮閩省漳泉等府人氏。	宮中檔乾隆朝奏摺，第 1 輯，頁 21，乾隆 14 年 3 月 12 日。	1749
民非土著，大抵漳、泉、惠、潮之人居多；故習尚與內地無甚異。	重修臺灣縣志，頁 397/風土志/風俗。	1752
臺灣一郡，孤懸海外，人民煙戶，土著者少，流寓者多，皆係閩之漳泉，粵之惠潮，遷移赴彼。	宮中檔乾隆朝奏摺，第 12 輯，頁 478。乾隆 20 年 9 月 11 日，福建巡撫鍾音揆奏摺。	1755
憤冒籍之縱橫，於甲戌春，僉稟縣主徐批：「查定例：入籍三十年有廬墓、眷、產者，方准考試。臺地土著者少，流寓者多，冒籍之弊，致難稽察。……。」	臺灣南部碑文集成，頁 384/嚴禁冒籍應考條例碑記(乾隆 20 年)。	1755
蓋民鮮土著，則有輕去之思；人有室家，各謀久安之計。	續修臺灣府志，頁 727/吳士功/題准臺民搬眷過臺疏。	1760
臺灣一郡，除番子之外，絕無土著之民，俱係外來流寓，內閩人約數十萬，粵人約十餘萬。熟番統計百十社，不及萬丁……。	軍機處檔·月摺包，10889 號。乾隆 34 年 9 月 24 日，閩浙總督崔應階奏摺錄副。	1769
再查臺灣地方本無土著，以全郡而論，漳、泉、廣東三處民人居其大半；而福州、汀州、興化等府民人寄籍者亦多。	欽定平定臺灣紀略，頁 804-805/乾隆 53 年 1 月 4-11 日。	1787
奏稱：臺灣為五方雜處之區，本無土著，祇因地土膏腴易於謀生食力，民人挈眷居住日聚日多。	臺灣采訪冊，頁 63/大學士九卿議覆公中堂福議奏。	1788
臺灣一郡……五方雜處，民不土著而無恆產。	海濱大事記，頁 46/楊廷理/東瀛紀事/序。	1790
然而正民之難，莫臺灣為甚矣……民非土著、經界不一，賦役所施，難易靡常。	續修臺灣縣志，頁 59/政志。	1807
臺民土著者少、客籍者多，萬祥加意撫綏，各得其所。	碑傳選集，頁 333/王萬祥/太子少保敏壯王公傳。	1821-1850?

竊照臺灣孤懸海外，民無土著，俗本輕浮，素有內地游民，偷越私渡。	道咸同光四朝奏議選輯，頁 1/趙慎畛、孫爾準查辦臺灣清莊事宜疏（道光 5 年）。	1825
臺灣民無土著，皆閩、粵之人寄居，學校向有閩籍、粵籍之分。	清耆獻類徵選編，頁 1525/史致儼。	1826
乾隆十四年……時縣治新設，居民尚少土著。自內地寄籍者，十之六七，每慮死無葬地。	彰化縣志，頁 101/官秩志/列傳。	1830
臺地民情浮動，居民皆非土著，向有漳、泉各府之人往來寄寓……。	清文宗實錄選輯，頁 25/咸豐 3 年。	1853
臺地民非土著。泉之人行乎泉，漳之人行乎漳，江浙兩粵之人行乎江浙兩粵，未盡同風。	福建通志臺灣府，頁 203/臺灣府/風俗（歲時氣候附）。	1871
臺舊為荷蘭所闢，土著絕跡，僑此者多泉、漳二郡人。	後蘇龕合集，頁 365/陳游戎墓志銘。	1894

清領臺灣後，移墾臺地的漢移民以閩、粵二籍為主，因此，就相對於「土著」（不論是原住民或「世居之民」）之「客」而言，係指外來移民之意，故其所指稱的人群意涵，實包括閩粵二籍移民。換言之，不僅「粵東惠潮」，連「閩省漳泉」亦被視為「流寓」、「客民」或「客籍」（參見表 3）。在閩粵移民世居臺地二、三代之後，史志中仍可見指稱「非定居本地的外來移民」的「客」之書寫，尤其是在編查保甲的過程中，常見有「客民」、「客籍」的記載，如「凡客民在地方開張貿易，或置有產業者，與土著一例順編；其往來無定商賈，責令客長查察」。⁷⁵「近因逆犯逃亡，奉文嚴查保甲，以為逐戶排搜之計，則山中五方雜處，客民甚多」。⁷⁶「惟淡水所轄終屬幅員寬闊，雖有聚居之村落，毫無連接之鄉庄，編造戶口冊籍，殊難驟期周遍，又兼客籍居多，遷徙靡定，其查造不易之情形」等，⁷⁷不一而

⁷⁵ 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臺灣私法人事編》（文叢第 117 種，1961 年），頁 335，編查保甲條款。

⁷⁶ 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臺灣私法人事編》，頁 345，保甲事宜。

⁷⁷ 「淡水分府陳星聚呈報同治十二年保甲清冊所以未克造送之因並呈送同治十三年分編查之戶口清冊」，《淡新檔案》，國立臺灣大學藏，檔號：12403.47。

足，其所指稱的人群意涵，亦非客方言人群。因為相對於「土著」而言，「迫於饑寒，即屬犯罪脫逃，單身獨旅，寄寓臺灣，居無定處，出無定方，往往不安本分，呼朋引類，嘯聚為奸」⁷⁸的「客」之人群意涵不僅可能來自閩、粵二省，亦可能包含使用客方言或閩南方言的人群。

表 3：閩粵皆「客」之史料舉隅

引	文	內	容	出	處	原刊時間
	臺郡古荒遠地，所聚廬托處者，非有祖貽孫承世其家業也；大抵漳、泉之人來居之。此外，或自福興而至，或自惠、潮而來，雖各循土風，而大端亦不甚遠焉。			鳳山縣志，頁 79/風土志/漢俗。		1720
	佃丁係漳、泉、潮、惠客民，因貪地寬可以私墾，故冒險渡臺。			新竹縣志初稿，頁 219/尹秦/臺灣田糧利弊疏（雍正 5 年）。		1727
	該地流寓多，而土著少，流寓之人，俱係粵東惠、潮，閩省漳、泉等府人民。			宮中檔乾隆朝奏摺，第 1 輯，頁 21，乾隆 14 年 3 月 12 日，福建巡撫潘思 奏摺。		1749
	據蚶江通判陳惇、廈門同知劉嘉會等稟報：「鹿仔港一帶現有泉州、興化、廣東客民各書『義民』字樣，共相守護。」			清高宗實錄選輯，頁 319/乾隆 52 年 1 月。		1787
	臺灣流寓，本多福建漳、泉、廣東惠、潮無業之民，各分黨翼，械鬥成風，以致糾眾不法。			欽定平定臺灣紀略，頁 34/御製詩。		1788
	臺灣鎮總兵武隆阿奏懇來京陛見一摺：……現雖洋面肅清，漳、泉客民鬥案，亦俱完結。			福建通志臺灣府，頁 27/嘉慶 16 年 2 月上諭。		1811
	值耿氏開藩福建，海禁弛；乃招徠客民，漳、泉、惠、潮習水者趨地利，泛海寄居也。			清初海疆圖說，頁 119-120/俞正燮/臺灣府屬渡口考。		1812
	臺灣一島，……其客民多漳、泉、潮、嘉剛猛耐苦之人。			同治甲戌日兵侵臺始末，頁 264/11 月辛亥兩江總督李宗羲奏。		1874
	臺灣……土著者寥寥，潮、嘉、漳、泉客民居之甚夥。			臺灣海防並開山日記，頁 72/方濬頤/臺灣地勢番情紀略。		1874

⁷⁸ 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臺案彙錄已集》（文叢第 191 種，1964 年），頁 131-132，巡臺御史覺羅柏修等奏摺，雍正 11 年 3 月初 3 日。

按臺民皆客籍，各樹黨類，漳與泉仇，漳泉合又與粵仇，勾眾忿，鳳山最甚。	臺游日記，頁 127/光緒 18 年 7 月。	1892
龜仔角山，在縣城南二十里……旁有番社，名曰龜仔角社。閩、粵客民，寄居其間。	恒春縣志，頁 253/山川/山。	1893
道光十二年，嘉義客民閩人陳辦與粵民爭牛起釁，糾眾攻雙溪口。	雲林縣采訪冊，頁 39/斗六堡/兵事/土寇。	1893-1894
李云：臺灣係潮州、漳、泉客民遷往，最為強悍！	馬關議和中之伊李問答，頁 17/問答節略。	1895
觀音山……兩相環抱，昔人每引此以嘲流寓不返者。蓋閩、粵客籍，每贅於臺人養童媳之家，歸國十無一、二焉。	臺灣詩鈔，頁 302/林景仁/東寧雜詠一百首。	1924-1925?

其次，別於閩主而粵客。清代臺灣相關文獻中，除了上述別於「土著」之「客」外，另有許多諸如「山客」、「客仔」或「客子」和「客人」等之記載，此係長期以來最容易被直接視為客方言人群的部分，然其所指涉的人群意涵究竟為何？在了解近代客家意識的形塑過程之後，則文獻書寫之「客」=客方言人群，如此不辯自明的說法，似乎有進一步釐清之必要。

關於「客人」、「客仔」、「山客」、「客莊」等記載，最早係大量出現在康熙末年諸羅、臺灣、鳳山三縣的志書當中。歸納來看，其所指稱的「客庄」，係由於潮人「名曰客人」，故「莊亦稱客庄」，漳、泉人則稱之曰「客仔」。就清領臺之初「客仔」、「客莊」的分布而言，當時的臺灣縣沒有客莊，「其比戶而居者，非泉即漳」。客莊主要分布於臺灣縣「南、北二路之遠方」，就其北路的諸羅縣境而言，在下加冬至斗六門間，客莊與漳泉人相半，斗六門以北客莊愈多。就其南路的鳳山縣境而言，則自淡水溪以南「客人尤夥」。

表 4：指粵東移民為「客」之史料舉隅

引	文	內	容	出	處	原刊時間
	佃田者，多內地依山之獷悍無賴下貧觸法亡命，潮人尤多；厥名曰客；多者千人、少亦數百；號曰客莊。朋比齊力，而自護小故，輒譁然以起，			諸羅縣志，頁 136-137/風俗志/漢俗。		1717

<p>毆而殺人、毀匿其尸……及客莊盛，盜益滋。莊主多僑居郡治，借客之力以共其狙；猝有事，皆左袒。……諸羅自急水溪以下，距郡治不遠，俗頗與臺灣同。自下加冬至斗六門，客莊、漳泉人相半，稍失之野；然近縣故畏法。斗六以北客莊愈多，雜諸番而各自為俗，風景亦殊鄣以下矣。</p>		
<p>各莊佣丁，山客十居七、八，靡有室家；漳、泉人稱之曰客仔。客稱莊主，曰頭家。頭家始藉其力以墾草地，招而來之；漸乃引類呼朋、連千累百，饑來飽去，行兇竊盜，頭家不得過而問矣。田之轉移交兌，頭家拱手以聽，權盡出於佃丁。初，臺人以客莊盛，盜漸多，各鑄鐵烙牛，以其字為號，便於識別。盜得牛，更鑄錢，取字之相似者覆以亂之。牛入客莊，即不得問。</p>	<p>諸羅縣志，頁 148-149/風俗志/漢俗/雜俗。</p>	1717
<p>……以上所載歲時，多漳、泉之人流寓者。客莊亦大略相似。</p>	<p>諸羅縣志，頁 153/風俗志/漢俗/歲時。</p>	1717
<p>臺無客莊（客莊，潮人所居之莊也。北路自諸羅山以上、南路自淡水溪而下，類皆潮人聚集以耕，名曰客人，故莊亦稱客莊。每莊至數百人，少者亦百餘，漳、泉之人不與焉。以其不同類也），比戶而居者，非泉人、則漳人也；盡力於南畝之間。……客人多處於南、北二路之遠方；近年以來，賃住四坊內者，不可勝數。</p>	<p>臺灣縣志，頁 57、60/風俗/雜俗。</p>	1720
<p>鳳山自縣治北抵安平鎮等處，俗略與郡治同。由縣治南至金荊潭一帶，稍近喬野。自淡水溪以南，則番、漢雜居，而客人尤夥；好事輕生，健訟樂鬥，所從來舊矣。</p>	<p>鳳山縣志，頁 80/風土志/漢俗。</p>	1720
<p>至於客莊，亦多內郡之人；故儀文不至大相遠云。</p>	<p>鳳山縣志，頁 87/風土志/歲時。</p>	1720
<p>南路賊首杜君英於是日遣楊來、顏子京率其眾百人之一貴所，稱君英在下淡水檳榔林招集粵東種地傭工客民，與陳福壽、劉國基議共掠臺灣府庫。</p>	<p>平臺紀略，頁 2/康熙 60 年 4 月。</p>	1723
<p>臺民素無土著，皆內地作奸逋逃之輩，群聚閭處，半閩、半粵。粵民全無妻室，佃耕行傭，謂之「客子」，每村落聚居千人、百人，謂之「客莊」。客</p>	<p>平臺紀略，頁 67/經理臺灣疏。</p>	1723

莊居民，結黨尚爭，好訟樂鬥，或毆殺人，匿滅跡，白晝掠人牛，莫敢過問，由來舊矣。		
朱一貴以飼鴨鄙夫，狡焉倡亂。杜君英以傭工客子，肆其狂謀。遂合兩地賊兵，膽造滔天罪孽。	東征集，頁 6/六月丙午大捷攻克鹿耳門收復安平露布。	1723
汝等漳泉百姓但知漳泉是親，客莊居民又但知客民是親；自本鎮道府視之，則均是臺灣百姓，均是治下子民，有善必賞，有惡必誅，未嘗有輕重厚薄之異。即在汝等客民，與漳泉各處之人，同自內地出來，同屬天涯海外、離鄉背井之客，為貧所驅，彼此同痛。	東征集，頁 81/諭閩粵民人。	1723
今與汝民約：從前之事盡付逝流，一概勿論；以後不許再分黨羽，再尋仇讐。漳、泉海豐、三陽之人經過客莊，客民經過漳、泉村落，宜各釋前怨，共敦新好，為盛世之良民；或有言語爭競，則投明鄉保耆老，據理勸息，庶幾興仁興讓之風。	重修臺灣府志，頁 633-634/諭閩粵民人（代）。	1723
廣東饒平、程鄉、大埔、平遠等縣之人赴臺傭雇佃田者，謂之客子。每村落聚居千人或數百人，謂之客莊。客莊居民朋比為黨。……凡牛入客莊，莫敢向問；問則縛牛主為盜，易己牛赴官以實之。官莫能辨，多墮其計。此不可不知也。……客莊居民，從無眷屬。合各府、各縣數十萬之傾側無賴遊手群萃其中，無室家宗族之係累，欲其無不逞也難矣。	平臺紀略，頁 51、52/與吳觀察論治臺灣事宜書。	1724
連日風聞臺灣復有小警。北路土番作孽，南路客子豎旗同謀，拒敵官兵。此異事也。南北路相去遙遠，民番情性不相聯屬；何以北路土番不軌，而南路客子即肯豎旗遙應？或者起釁之處不在土番，而在北路客子，所以南路豎旗，似因北路官兵討逆，未先慰安無罪，訛傳惶惑之所致也。……廣東潮惠人民，在臺種地傭工，謂之客子。所居莊曰客莊。人眾不下數十萬，皆無妻孥，時聞強悍。然其志在力田謀生，不敢稍萌異念。往年渡禁稍寬，皆于歲終賣穀還粵，置產贍家，春初又復之臺，歲以為常。辛丑朱一貴作亂，南路客子團結鄉社，奉大清皇帝萬歲牌與賊拒戰，蒙賜義	平臺紀略，頁 63/粵中風聞臺灣事論。	1732

民銀兩，功加職銜。墨審未乾，豈肯自為叛亂？愚意北路起釁，必繫一二無知客子，作奸拒捕，自料法網難逃，誑誘土番混擾分罪，造出盡勦客子之謠言，傳播煽惑，使在臺客子畏死惶亂，群相響應，是以南路無知有豎旗同謀之舉。		
又見淡水客民來得很多，大家紛紛逃走。小的走在半線地方被拏的。	臺案彙錄己集，頁 44/吳福生等供詞。	1732
澹水以南，悉為潮州客莊；治埤蓄洩，灌溉耕耨，頗盡力作。	臺海使槎錄，頁 53/赤坎筆談/物產。	1736
南路澹水三十三莊，皆粵民墾耕。辛丑變後，客民（閩人呼粵人曰客仔）與閩人不相和協。再功加外委，數至盈千，奸良莫辨；習拳勇，喜格鬥，倚恃護符，以武斷於鄉曲。	臺海使槎錄，頁 93/赤坎筆談/朱逆附略。	1736
雍正五年，前任督臣高其倬題請清楚臺灣學政疏內，……其時在臺民人，因原疏內並未聲明閩、粵一體字樣，遂以粵人為客民，始終攻揭，至今未得與考，誠屬缺典。	臺案彙錄丙集，頁 209/閩浙總督德沛題本。	1741
賊有杜君英者，粵客人也；藉稱一貴在其家，招集徒眾。	重修福建臺灣府志，頁 475/雜記/祥異。	1742
邑無客莊（客莊，粵人所居之莊也。北路自諸羅山以上，南路自淡水溪而下，類皆潮人聚集以耕，名曰客人，故莊亦稱客莊），比戶而居者，非泉人，則漳人也。	重修臺灣縣志，頁 401/風土志/風俗。	1752
閩恆散處，粵悉萃居，勢常不敵。南路賴君奏等所糾大莊十三、小莊六十四，並稱客莊，肆毒閩人。而永定、武平、上杭各縣之人，復與粵合，諸泉、漳人多舉家被殺被辱者。六月十三日，漳、泉糾黨數千，陸續分渡淡水，抵新園、小赤山、萬丹、濫濫莊等處，圖併客莊。王師已入安平，不之知也。……十九日，客莊齊豎「大清」旗，漳泉賊黨不鬥自潰。	重修臺灣縣志，頁 558/祥異/兵燹。	1752
二十五日，即有漳泉莊民遞呈三十六紙，皆指名具控粵人客莊管事藉義民名色，率眾焚搶之事，已發道查辦。閩粵各莊，素有仇隙。	臺案彙錄己集，頁 67/福建巡撫鄂寧摺。	1768
據劉麟遊供：……原籍嘉應州鎮平縣人……總是	臺案彙錄丙集，頁 216/吏部題本。	1772

粵人，在臺應試，原是客籍，但要實有產業，就算有根底入籍的了，大家都許考試，從不攻擊，所以里管族鄰都肯出結，就是地方官也無從查察的……乾隆三十七年十月初三日		
臺地素無土著，皆漳、泉、廣三郡之人徙居焉。地分南北，廣人實居其南，別以主客之名，而莊以立（漳泉人呼粵莊曰客莊）。此疆彼界，判然畛域。	臺陽筆記，頁 3/翟灝/粵莊義民記。	1805?
又有非僧非道者，以其出於粵客，名「客子師」……。	噶瑪蘭廳志，頁 191/風俗/民風。	1807
按全臺大勢，漳、泉之民居十分之六七，廣民在三四之間。以南北論，則北淡水、南鳳山多廣民，諸、彰二邑多閩戶；以內外論，則近海屬漳、泉之土著，近山多廣東之客莊。廣民驕悍騰銳，器械精良，閩民亦素畏之。	清經世文編選錄，頁 17/鄭光策/上福節相論臺事書。	1827
其村落，閩曰閩社，粵曰粵莊。閩呼粵人為「客」，分氣類積不相能，動輒聚眾持械鬥。	內自訟齋文選/內自訟齋文選，頁 31/周凱/記臺灣張丙之亂。	1834?
查臺地人民，約分五類：西面瀕海者，閩漳泉人為多，興化次之，福州較少；近山者則粵東惠、潮、嘉各處之人，號為客民……。	月摺檔，光緒 7 年 2 月 3 日，福建巡撫勒方鈞奏摺抄件。	1881
李喬基，……嘉應州人……廣東嘉應、平遠、鎮平僑寓者謂之客人，南、北路各百餘莊。	碑傳選集，頁 556/吳蘭修/李喬基傳。	1893
有所謂客莊；客人者，皆粵人也。莊如西門外之保力、統埔、四重溪、內埔等及城內之客人街是。……其閩籍者，則不繫以客，亦不與番同處云。	恒春縣志，頁 9/疆域。	1894
臺灣本無土著，生番即其土著。然自閩之漳泉、粵之惠潮嘉，自內地徙居，歷年已久，悉成土著。而臺地所稱客莊者，乃指粵人所居而言，是閩又以粵為客矣。其土風不同，俗尚互異。	鳳山縣采訪冊，頁 13/附修志事宜十四條。	1894
福人（粵稱閩人曰福老，謂福建人也）競渡而逃西（下淡水在縣境之東，逃西者，謂西渡淡水溪來歸縣治也），客子循溪而逐北（客子指粵人，以其籍隸廣東，與我閩有主客之分也）。	鳳山縣采訪冊，頁 427-428/鄭蘭/勦平許逆紀事。	1894

近山之莊曰客莊，粵籍人也。風俗與漳、泉之移民小異。女不裹腳，男喜沐浴，語音獨別，均是潮、惠鄉譯。	安平縣雜記，頁 9/風俗。	1897
臺地四面皆海，閩人為主籍，粵人為客籍，山外為熟番，山內為生番。	清經世文編選錄，頁 26/鄒鳴鶴/上楊中丞書。	1897

此外，康熙 60（1721）年朱一貴事起後，隨從兄南澳總兵藍廷珍統師赴臺的藍鼎元，在其所著之《東征集》與《平臺紀略》中，對康雍年間臺灣的「客子」、「客莊」、「客民」等亦留下相當多的文字記載。藍鼎元對「客子」的解釋是「廣東饒平、程鄉、大埔、平遠等縣之人赴臺傭雇佃田者」、「廣東潮惠人民，在臺種地傭工，謂之客子」，又「粵民全無妻室，佃耕行傭，謂之客子」，其所居莊曰「客莊」，且又將「客莊居民」稱為「客民」。

康熙末年的三縣志書及康雍年間藍鼎元的著作之後，清代臺灣相關文獻中零星出現有關「客仔」或「客莊」等描敘，多係引自上述資料。而這些即構成了後世將「客」視為客方言人群的主要資料來源。對於當時史志中所論述的「客仔」或「客莊」，其實可以歸納出一些共性，如同屬粵籍、耕佃身分，⁷⁹且以負面批評居多，諸如「從無眷屬」、「結黨尚爭」、「引類呼朋、連千累百，饑來飽去，行兇竊盜」、「牛入客莊，即不得問」、「好事輕生，健訟樂鬥」等。而官方對渡臺潮惠移民此類負面的觀感與評價，在康雍年間有了轉變。其中的關鍵，在於朱一貴亂起後，當時下淡水客庄「團結鄉社，奉大清皇帝萬歲牌與賊拒戰，蒙賜義民銀兩，功加職銜」，此後，臺地粵民屢有以義民身分助官平亂之舉。因此，藍鼎元在後期，對於粵民流徙特質的說法，不若以往的批判語氣，而以客觀的文字指出其「往年渡禁稍寬，皆于歲終賣穀還粵，置產贍家，春初又復之臺，歲以為常」。康雍之後，清代臺灣文獻中也少見有「客人」、「客莊」、「客仔」等形容粵民流徙生事的負面記載。

值得進一步了解的是，當時被指為「客」之人群意涵，有其寬窄不同

⁷⁹ 李文良：〈清初臺灣方志的「客家」書寫與社會相〉，《臺大歷史學報》，第 31 期，頁 144。

的定義，由大到小來看，有「粵民」、「廣東潮惠人民」、「潮人」、「廣東饒平、程鄉、大埔、平遠等縣之人」等。而這些被指為「客」的一群人是否即是今日我們普遍認知的客方言人群？究其實，清初臺灣方志中的「客」，雖已具有指涉有同樣的祖籍、維生方式和文化形態的一群人的性質，但其共同性只是文獻上的表現而已，其內部卻可能存在語言、文化的異質性。⁸⁰關於這個部分，康熙末年朱一貴亂平之後，閩浙總督覺羅滿保「題義民效力議效疏」，對清領臺之初渡臺粵民之人群屬性留下非常珍貴且細緻的記錄：

查臺灣鳳山縣屬之南路淡水，歷有漳、泉、汀、潮四府之人，墾田居住。潮屬之潮陽、海陽、揭陽、饒平數縣與漳、泉之人語言聲氣相通，而潮屬之鎮平、平遠、程鄉三縣則又有汀州之人自為守望，不與漳、泉之人同夥相雜。六十年四月二十二日，賊犯杜君英等在南路淡水檳榔林招夥豎旗搶劫新園，北渡淡水溪侵犯南路營，多係潮之三陽及漳、泉人同夥作亂。而鎮平、程鄉、平遠三縣之民，並無入夥。三縣義民……糾集十三大莊、六十四小莊，合鎮平、程鄉、平遠、永定、武平、大埔、上杭各縣之人，共一萬二千餘名於萬丹社，拜叩天地豎旗，立「大清」旗號，供奉皇上萬歲聖旨牌。⁸¹

就以上覺羅滿保的觀察可知，當時粵籍移民當中，存在著不同方言人群的分類情形。其中，其所言之「潮屬之鎮平、平遠、程鄉三縣」即今我們所認知的客方言人群，但同屬粵省之「潮屬之潮陽、海陽、揭陽、饒平數縣」之人則與「漳、泉之人語言聲氣相通」。

清初臺地粵籍移民內存在不同方言人群的情形，一直以來常為後世研究者所忽略，而此或許也是後人容易逕將文獻上用以指稱粵東移民的「客」

⁸⁰ 李文良在〈清初臺灣方志的「客家」書寫與社會相〉文中雖觀察到清初志書中的「客」內部存在語言、文化的異質性，但卻又直接將方志中的「客」直接指稱為客家，似乎有些矛盾。李文良：〈清初臺灣方志的「客家」書寫與社會相〉，頁144。

⁸¹ 覺羅滿保：〈題義民效力議效疏〉，收於王瑛曾：《重修鳳山縣志》（文叢第146種，1962年；1764年原刊），頁343-344。

等於同「客方言人群」的原因之一。若自粵省移民的原鄉來看，明清之際廣東省廣府、福佬、客家三大方言人群即已版塊分明。其中潮汕平原及粵東沿海，包括揭陽、潮陽、海陽、饒平、惠來、澄海、普寧、揭西、南澳等縣，屬於粵省的福佬文化區。此區居民主要來自福建，幾乎全部使用閩南語，故有「福佬」之稱。⁸²粵省福佬與閩省之關係非常密切，早在宋代，即已有人觀察到潮州「雖境土有閩廣之異，而風俗無潮漳之分」，「土俗熙熙，無福建廣南之異」，「有廣南福建之語」，可知宋代福建移民及其後裔已是潮州人的主體部分，閩語是潮州的主要語言，潮州已成為福建文化區的一部分。⁸³因此，乾隆末年因林爽文亂至臺的松江提督藍元枚即曾觀察到「臺灣語音與廣東之潮州相同」。⁸⁴也由於方言及風土文化之類同，因此清代臺灣常見有「潮雖粵而亦黨漳」之情形。⁸⁵

若要進一步了解清代臺灣史志中的「客」是否係指稱客方言人群，此粵屬福佬方言人群的身分如何被識別與區分是一個非常重要的面向。承上述可知，康熙年間臺灣史志中頻頻出現的「客人」、「客仔」、「客民」、「客莊」等記載，係用於指稱「粵民」、「廣東潮惠人民」、「潮人」、「廣東饒平、程鄉、大埔、平遠等縣之人」等人群意涵，而此「客」之人群意涵是否有區別出同屬粵省的客方言與福佬方言人群？答案似乎是否定的。因為覺羅滿保所言之與「漳、泉之人語言聲氣相通」之粵省福佬方言人群，如原籍潮州府海陽縣的杜君英，⁸⁶被稱為「傭工客子」、「粵客人」；潮陽、揭陽、海陽等縣移民，藍鼎元亦一視同仁地稱為「粵東種地傭工客民」。⁸⁷即清代臺灣史志中「客子」、「客人」、「客民」等歷史稱謂，實包括兩種不同的方言人群，即粵省內不論客方言或福佬語系的人群，由於同屬粵籍，皆一律

⁸² 司徒尚紀：《廣東文化地理》（韶關：廣東人民出版社，1993年），頁394。

⁸³ 吳松弟：《中國移民史》，第4卷，遼宋金元時期，頁185。

⁸⁴ 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欽定平定臺灣紀略》（文叢第102種，1961年），頁149，正月27日至2月初5日。

⁸⁵ 姚瑩：《東槎紀略》（文叢第7種，1957年），頁110-111，答李信齋論臺灣治事書。

⁸⁶ 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臺案彙錄已集》（文叢第191種，1964年），頁18，〈朱一貴謀反殘件〉。

⁸⁷ 藍鼎元：《平臺紀略》，頁2。

被視為「客」。因此，清初臺灣史志上之「客」之書寫，是否能用於指稱客方言人群，即如今所認知的客家，就值得懷疑了。

清代臺灣方言人群的分類，除上述粵屬潮民附閩外，亦可見同屬客方言人群的閩屬汀州移民附粵的情形，即如上引覺羅滿保「題義民效力議效疏」中載明當時下淡水地區的「潮屬之鎮平、平遠、程鄉三縣則又有汀州之人自為守望，不與漳、泉之人同夥相雜」。汀民附粵的相關觀察，除康熙末年的覺羅滿保外，在道光年間的相關文獻中亦屢屢可見。如道光 6（1826）年閩浙總督孫爾準奏稱：

臺灣土著之民，皆閩粵兩籍寄居，粵則惠、潮兩府，嘉應一州；閩則漳、泉、汀三府，汀人附粵而不附閩。粵人性直而知畏法，為盜者頗少，惠、潮兩處之人聯為一起，嘉應則好訟多事，與惠、潮時合時分。閩人既與粵人不睦，而漳人與泉人又互相仇隙。⁸⁸

又，道光 13（1833）年，臺灣北路淡水廳一帶發生的分類械鬥事件，其敵對的兩個陣營即「閩籍漳州」與「粵籍惠潮及附粵之汀州」。⁸⁹因此，我們可以了解，清代臺灣漢人在人群分類的過程中，確實存在有同屬客方言人群的跨省結合。然而，值得進一步思考的是，此種客方言人群的跨省認同與結合，是否曾反映於史志上所記載的「客」？即閩屬的客方言人群，在清代臺灣是否亦被視為「客」之一部分？

關於這個部分，可由清代在臺粵民參與科舉考試的權利問題進一步觀察。雍正 5（1727）年，閩浙總督高其倬奏請清釐臺灣學政疏，由於疏內並未聲明閩、粵一體字樣，造成省內閩人以「粵人為客民，始終攻揭」，終至粵民始終未得與考。⁹⁰乾隆 5（1740）年巡視臺灣御史兼學政楊二酉即因「粵民流寓入籍，均有戶冊可稽，閩童恐其佔籍，攻擊惟嚴」，故奏請另編

⁸⁸ 「閩浙總督孫爾準奏摺抄件」（道光 6 年 11 月 14 日），《外紀檔》，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⁸⁹ 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清宣宗實錄選輯》（文叢第 188 種，1964 年），道光 13 年，頁 133-134。

⁹⁰ 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臺案彙錄丙集》，頁 209，〈閩浙總督德沛題本〉。

新字號應試獲准。此後在臺粵民亦准考試，分其卷為粵籍，⁹¹於四縣各取二名，附入府學。⁹²道光年間，粵字號額中舉人一名，但貢生仍和入閩籍，一體選取。對於當時臺地「歷科拔貢，有閩無粵」的情形，臺灣道徐宗幹的說法是，「非粵人無可選，閩人多而粵人少，且究係寄籍，不能不先儘閩人」，由此可見，由於閩主粵客，使得閩粵二省移民在參與科舉考試的權利地位明顯不同。⁹³

曾有學者指出，清代在實行攤丁入畝後，農民與土地的人身依附關係從法律上有很大的削弱，但法律制度作為一個體系，因牽涉學額等問題，使「土籍」與「客籍」的界限往往仍然判然 互其間。⁹⁴清代臺灣，在未獨立設省之前，一直屬福建省所轄，因此渡臺之閩、粵移民，在參與科舉考試的權利上，閩主粵客的界線即涇渭分明。如乾隆 37（1772）年原籍嘉應州鎮平縣人的劉麟遊即言「總是粵人，在臺應試，原是客籍」。⁹⁵因此，即使「汀州雖閩郡，近粵情無歧」，⁹⁶在人群的分類上也時有「附粵不附閩」的情形發生，但在諸如學額等資源的分配上，閩主粵客的明顯界線卻造成閩粵二省客方言人群有著迥然不同的歷史處境。

綜上而論，清代臺灣史志中「客」之意涵，有依時遞變的過程，在時序上可看出其流徙到定著的過程。初始，對於「客」之描寫，多述及其候鳥型的移墾方式與佃耕身分，甚或是好訟樂鬥的負面形象。時序愈往後，史志中「客」之意涵，已少了以上形象的描述，但粵民仍被稱為「客」，其人群的分界線主要以省籍為主。如乾、嘉年間，翟灝言「漳、泉人呼粵莊

⁹¹ 朱仕玠：《小琉球漫誌》（文叢第 3 種，1957 年），頁 52，海東賸語(上)，粵籍。

⁹² 蔣師轍：《臺游日記》（文叢第 6 種，1957 年），頁 18，光緒 18 年 4 月。

⁹³ 徐宗幹：〈學政議〉，收於丁曰健：《治臺必告錄》（文叢第 17 種，1959 年），頁 340。

⁹⁴ 張世明、龔勝泉：〈另類社會空間：中國邊疆移民社會主要特殊性透視（1644-1949）〉，《中國邊疆史地研究》，2006 年第 1 期，頁 78-88。

⁹⁵ 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臺案彙錄丙集》，頁 216，吏部題本。

⁹⁶ 丘逢甲：《嶺雲海日樓詩鈔》（文叢第 70 種，1960 年；1937 年原刊），頁 326，〈曉滄惠香米兼以詩貺賦此為謝並送之汀州〉。

曰客莊」；⁹⁷道光年間，周凱言「閩呼粵人為客」；⁹⁸鄒鳴鶴於〈上楊中丞書〉中，亦言「閩人為主籍，粵人為客籍」；⁹⁹光緒末年之《鳳山采訪冊》中，亦載「客子指粵人，以其籍隸廣東，與我閩有主客之分也」。¹⁰⁰由此可見清代臺灣「客」之人群意涵，實未將閩省的客方言人群含括在內，客與非客的界限明顯是在省籍，而非方言之異同。

綜上可知，在近代族群或方言人群的認知尚未成形之前，清代的史志紀錄是以籍貫為分類界線，因此有閩粵之分，也會有嘉潮惠之分。¹⁰¹文獻中「客」之書寫，一直以來都只是官方或漳、泉移民的他稱，是當時官員或閩人以粵人隔省流寓，由粵至閩屬臺灣墾殖，故稱其為「客」，乃以省籍差異使然，不必然以方言為判定的標準。從另一個角度來看，清代臺灣，被指稱為「客」的粵民，其自我認同的邊界仍是省籍，故時以「粵人」或「粵民」自稱。如乾隆 52（1787）年下淡水地區的山豬毛義民，向閩浙總督常青連名呈稱懇准令隨征時，即自言：「粵民等祖父，自康熙六十年、雍正十年，逆匪朱一貴、吳福生等先後倡亂，屢從征勦，皆邀議敘職銜。」¹⁰²咸豐 4（1854）年，中港閩人與附近的田寮庄粵民因牛隻引發分籍械鬥，卻因此向北擴散至中壢一帶，新社、六張犁、番仔陂、大湖口、楊梅壠等地無一倖免，當時淡水粵民為分類械鬥自清的陳情書，亦屢屢自稱「粵庄」、「粵人」、「全粵」。¹⁰³由此可知，即使粵民在清代臺灣屢被以「客」稱之，且渡臺粵民之大部分確為後世所認知的客方言人群，但其自我認同的族群

⁹⁷ 翟灝：〈粵莊義民記〉，《臺陽筆記》（文叢第 20 種，1958 年；1793-1808 年間刊本），頁 3。

⁹⁸ 周凱：〈記臺灣張丙之亂〉，《內自訟齊文選》（文叢第 82 種，1960 年；1840 年原刊），頁 31。

⁹⁹ 鄒鳴鶴：〈上楊中丞書〉，《清經世文編選錄》（文叢第 229 種，1966 年），頁 26。

¹⁰⁰ 盧德嘉：《鳳山縣采訪冊》（文叢第 73 種，1960 年；1894 年原刊），頁 428。

¹⁰¹ 楊聰榮：〈從族群關係史看臺灣客家的分類範疇與獨特性〉。

¹⁰² 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欽定平定臺灣紀略》（文叢第 102 種，1961 年），頁 573，9 月初 7 日至 12 日。

¹⁰³ 羅來錦：〈為全淡粵冤事上書〉，未刊稿，1854 年，轉引自羅烈師：〈客家族群與客家社會：臺灣竹塹地區客家社會之形成〉，收入徐正光編：《聚落、宗族與族群》（臺北：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2001 年），頁 115-152。

邊界，形之於文字時，仍是省籍，而非方言。

另一個可以再思考的面向是，「客」在中國文字的使用上有其原本含義，在近代帶有族群定義，以方言群為邊界的客家意識尚未形成之前，清代臺灣文獻上的「客」應不可能用以指稱使用客方言的族群。此或可由原籍廣東嘉應州，於清道光年間隨父渡臺謀生而家於淡水的吳子光，在同治年間仍不解為何閩粵贛三省邊區居民之方言，會被稱為「客籍語」的情形中略窺一二：

至閩、粵、江右三省，本鄰境也，若閩之延建邵汀、粵之嘉應大埔豐順龍川、江右之南贛等處，謂為客籍語，不知何據。豈因戶有主客之分，主則土著、客則行國，本其始言之，後遂一成不變歟？¹⁰⁴

由以上吳子光對「客籍語」的疑惑可知，雖然嘉慶年間在粵省惠州地區已有徐旭曾之客方言人群的自我認同宣言產生，但遲至同治年間，自客方言原鄉渡海來臺的吳子光卻仍無法了解為何「客」可以用以指稱方言人群。

前文曾指出，清代臺灣文獻中的「客」與「粵」為建構清代臺灣客方言人群史的主要素材。若文獻中之「客」係指閩主粵客的省籍之別，則引粵為客（方言人群），則可能是因為認為文獻書寫之「客」＝「客」方言人群，而逕將被稱為「客仔」、「客民」的「粵民」、「廣東潮惠人民」、「潮人」、「廣東饒平、程鄉、大埔、平遠等縣之人」視為「客」方言人群。然而，將文獻書寫之「客」、「粵」逕視為「客」方言人群，容易形成研究上的盲點。其一，若視「客」之書寫等同於「客」方言人群，容易因此忽略閩省汀州府，甚或漳州府中同樣使用客方言的人群；其二，將文獻上的「粵」直接解釋為「客」方言人群，則又可能誤將使用福佬方言的粵省潮州人含括進來。因此，惟有還原清代與臺灣相關歷史文獻上「客」與「粵」的真正意涵，才不致在錯誤的基礎上進行研究。

¹⁰⁴ 吳子光：《臺灣紀事》（文叢第36種，1959年），頁97，花猪客民。

二、清代臺灣的主客之別與廣府地區的土客之別

明清時期，使用客方言的人群紛紛自閩粵贛邊區之大本營向外發展，北往贛南，西向四川，南下廣東珠江三角洲或粵省沿岸，甚或渡海至臺灣或東南亞各地。這一波由原居地向外移墾的客方言人群，在移住地皆面臨不同的土客或主客問題。近代的客家意識形成於廣東省境內與廣府人的土客衝突過程中，被稱為「客」的一群人，由於其方言、風土相似，且同是外來者的身分，因此在與先住民的互動過程中，找到族群的邊界，將「客」視為自我族群身分的命名，也將「客」用以稱呼自我族群使用的方言。換言之，具有現代族群意識的客家意識，是客方言人群與廣府人互動的結果，如今客家的英文拼法「hakka」即是以廣東話發音而來，¹⁰⁵換言之，「hakka」一詞的出現有其特殊的時空背景，而其本身即可充分說明客家意識形成的歷史脈絡。

我們必須了解，客家族群論述發軔的地點並不是發生在號稱客家大本營的閩粵贛邊區，而是發生在離散客家與廣府本地人的族群邊界，其客家意識形成的經過，也未必是放諸四海而皆準的。客方言人群自閩粵贛地區外移，在廣東省境內因與廣府人互動折衝而產生客家意識的同時，生活在閩粵贛地區的居民，既不知道也無從認同自己是客家人。因此，康熙《程鄉縣志》、乾隆《嘉應州志》等客方言人群原鄉的志書中，皆無以「客」做為族稱的記載。¹⁰⁶道光年間嘉應州鎮平人黃釗撰《石窟一徵》，全書亦未提到「客家」一詞，由其論述內容可知，當時梅州人的身分認同是粵人，並未自稱我群為客家。¹⁰⁷除了客方言人群原鄉的居民無從認同於客家意識外，外移至其他地區，面臨不同的土客或主客衝突的客方言人群亦復如此，皆有其不同的歷史脈絡與時空環境，未必能以與廣府族群互動而成形的客家意識不由分說地加以定義之。

¹⁰⁵ 楊聰榮：〈從族群關係史看臺灣客家的分類範疇與獨特性〉。

¹⁰⁶ 楊聰榮：〈從族群關係史看臺灣客家的分類範疇與獨特性〉。

¹⁰⁷ 高怡萍：〈徘徊於聚族與離散之間——粵東客家的族群論述與歷史記憶〉，國立清華大學人類學研究所博士論文，2004年，頁197-200。

其實，針對明清時期客方言人群各移住地中，相關文獻中「客」之書寫與後來「客家」二者間糾纏不清且 昧難明的關係，已逐漸有反省與嘗試釐清的傾向。如大陸學者饒偉新對清代以來贛南地區「客佃」、「客籍」等稱謂與「客家」關係的析論，即可以提供我們很好的參考。他認為清代贛南文獻中提到的「客佃」、「客籍」，與近代以來所謂的「客家」，實屬不同的兩個歷史範疇。前者是清代移墾過程和戶籍制度背景下的歷史產物，代表一個與「土著」、「土籍」對稱的移民範疇，主要指當時流寓在贛南山區佃耕墾種，且在戶籍制度上身處「客籍」地位的福建和廣東流民。後者作為晚清以來廣東地區社會文化變遷背景下的歷史產物，是一個具有近代種族和血統意義的民系範疇。因此，即使清代贛南文獻中偶有稱閩粵移民為「客家」的情形，如康熙 50（1711）年興國知縣張尚瑗言「興邑地處山陬，民多固陋，兼有閩廣流氓僑居境內，客家異籍，禮儀罔聞」，然而根據當時的戶籍制度背景以及這句話的上下文語境，其所稱之「客家」其實是指「客籍」之意。就其觀察，具有民系意義的「客家」在贛南之出現，是最近幾十年由於「客家熱」風潮而產生的。此後對贛南「客家」的認知，已不同於清代及民國贛南文獻中「客」之人群意涵，因為後來所稱之「客家」不僅指原本文獻上的「客」，還包括明清以前就定居在贛南的早期土著居民之後裔。¹⁰⁸

就清代臺灣相關文獻中用以指稱粵東移民的「客」與廣府地區「土客之爭」的「客」相較，我們也可以發現，二者所代表的人群意涵及歷史脈絡亦不盡相同，其明顯的相異處有三，略述如下。

其一，由閩粵贛邊區外移的客方言人群，在贛南、廣東等地皆面臨嚴重的土客衝突。在此，與「客」相對之「土」，非指原住地的少數民族，而係指先一步開墾落戶的其他漢族民系，即如朱希祖所言：「廣東之客家，不與土著之民相齟齬，乃與其鄰近先來之客相齟齬，先來之客，忘其己之為客，而自居於主」。¹⁰⁹清代臺灣文獻上用以指稱粵東移民的「客」，則非別

¹⁰⁸ 饒偉新：〈區域社會史視野下的「客家」稱謂由來考論——以清代以來贛南的「客佃」、「客籍」與「客家」為例〉，《民族研究》，2005年第6期，頁92-110。

¹⁰⁹ 朱希祖：〈客家研究導論序〉，收於羅香林：《客家研究導論》，頁1。

於先住民或本地人之「土」，而是別於福建本省之「主」。由於清領臺之初，臺地除了原住民族外，「素無土著」，因此，閩粵移民皆被視為流徙之「客民」，即閩粵之間並不存在先來後到的土客之別。但由於清代臺灣屬福建省轄，故即使閩粵移民抵臺時間互有先後，但粵民始終屬於隔省流寓的身分，閩主粵客的情形於焉產生。

其二，清代華南地區的土客關係，除了是先住民與後住民、本地與外來者之分類外，由上節的討論可知，方言之不同亦是土客族群界線之所在。如增城土著對自己所講方言與客民方言的看法是「語言與番禺無甚異，近山者剛而直，近水者清而婉。……至若客民隸增者，雖世閱數傳，鄉音無改，人耳嘈嘈，不問而知其為異籍也」。¹¹⁰亦如《赤溪縣志》中所言：

（赤溪）縣屬居民其先世俱於清初康、雍間來自惠潮嘉各州縣，所說亦客語也。……至咸豐四年，開、恩兩縣土客因事失和，釀成分聲械鬥……夫無論土民、客民，皆黃農裔也，只因方音不同，積年尋仇劇鬥，兩敗俱傷，為禍之烈，一至於此，雖由民俗勇於私鬥使然，亦在彼此語言扞格，易失感情，有以致之。¹¹¹

即不論是遷至何地的閩粵贛客方言人群，相對於該地區之「土」而言，皆是客，使用同一方言，社會經濟的處境有一定的共性。相較於華南地區土客之別與方言界線相吻合，清代臺灣的主客之別，則與方言界線呈現交錯的情形。清代臺灣，省籍與方言兩條界線割裂出的四種省籍與方言人群的組合，即閩屬福佬（漳、泉）、閩屬客家（汀州）、粵屬福佬（潮州）、粵屬客家（嘉應州）。¹¹²

¹¹⁰ 民國《增城縣志》，卷1，風俗。

¹¹¹ 王大魯修，賴際熙纂：《赤溪縣志》（臺北：成文出版社，1967年；1920年原刊），卷1，與地下·方言。

¹¹² 以上所言之四種省籍與方言人群的組合雖然實際存在，但卻未必能與州府層級的行政區劃相吻合。因為，清代移民臺灣的漢人原鄉，其方言與行政區劃的界線即未必吻合。移民臺地之漢人原鄉中，方言區與行政區劃相吻合的有「泉州府—閩南（福佬）方言」、「嘉應州、汀州府—客家方言」，而漳州府與潮州府則是以閩南方言為主，但部分地區散布客家方言。此外，嘉應州係於清雍正11年方自立為州，之前其地分屬於廣東省潮州、惠州二府，故清領臺之初渡臺之粵民，多被以「潮惠民人」稱之。

其三，清代華南地區因客方言人群外移而起的土客衝突中，其先住民多蔑稱外來移民為客民，並一直強調其負面形象。近代客家意識的形成，即由於被汙名化的過程。清代臺灣的情況則不盡相同，文獻中對於「客仔」、「客莊」負面評價多出現於康雍年間。臺地粵民自朱一貴事件之後，屢有從官平亂之舉，常扮演穩定社會，保衛鄉里的義民角色，與廣東西路之客方言人群被汙名化，被蔑稱為蠻族，非漢種的處境迥異。反映在文獻上，有稱「粵人性直而知畏法，為盜者頗少」¹¹³者，亦常見有將閩粵移民相互比較，強調粵民之安定社會的角色者，如乾隆 14（1749）年福建巡撫潘思奏稱：

……流寓之人，俱係粵東惠、潮，閩省漳、泉等府人氏。惠、潮之人，列庄而居，戶多殷實，不致流於匪僻；漳、泉之人，窮窘而散處，或代人傭作，或佃人地畝，或搭蓋寮廠，養鴨取魚以資生，甚至覬覦生番田土，侵墾番界，大抵不肖生事之輩，多出於漳、泉。其土著熟番，素為安分。¹¹⁴

又，乾隆 34（1769）年閩浙總督崔應階亦奏稱：

粵民多屬耕種為活，但貪得好勝，衛護同鄉，眾心齊一，間有並無恆產游手好閒者，亦十居二、三，既無恆業，易致為匪。至於在臺閩民，多半好勇鬥狠，聚散無常，惟利是務，恩不可結，法不可威，所謂狼子野心，最難約束。¹¹⁵

綜上可知，清代移墾臺灣的客方言人群不同於廣府地區面臨土客衝突的客方言人群的處境，當時渡臺之客方言人群係跨閩粵二省，在閩主粵客的客觀條件，加上粵民的義民角色，在省籍與方言界線的交錯中，皆使客方言人群難以找出立場一致的認同邊界，因此，我們很難相信清代臺灣的

¹¹³ 「閩浙總督孫爾準奏摺抄件」（道光 6 年 11 月 14 日），《外紀檔》，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¹¹⁴ 「福建巡撫潘思 奏摺」（乾隆 14 年 3 月 12 日），見國立故宮博物院編：《宮中檔乾隆朝奏摺》（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1982 年），第 1 輯，頁 21。

¹¹⁵ 「閩浙總督崔應階奏摺錄副」（乾隆 34 年 9 月 24 日），《軍機處檔·月摺包》，國立故宮博物院藏，第 2771 箱，71 包，10889 號。

客方言人群在嘉慶年間論及客人源流及方言前的清領臺之初，即已將「客」視為方言識別的界線，無論是他稱或是自稱。因為，直至同治年間，原籍嘉應州的吳子光仍不解「客籍語」之由來。誠然，清代臺灣，在省籍與方言群交錯的四種屬性的人群中，無可諱言，粵屬客家的確是清代臺灣文獻上「客」之大部分，但卻不能因此逕將文獻上的「客」視為客方言人群，因為其二者間實具有不同的歷史脈絡與人群意涵。

肆、結 論

客家方言人群的形塑有其階段性，可視為中國歷史上移民運動中，不同文化共性人群因互動而區別出來的認同意識。在明清時期，自閩粵贛邊區流徙各地的客方言人群，雖然是明清華南地區移民運動的最大多數，但不應逕將史籍中的「客」全用以解釋客家源流或客方言人群之歷史經驗，即如饒偉新所言，我們應該打破「起源偶像」，放棄以往客家學界迷戀於歷史文獻中帶有「客」字的歷史稱謂的歷史淵源之討論模式，必須回到各自歷史時空的脈絡下重塑或理解當時的族群關係。藉由本文之討論，我們似乎能更清楚的了解，清代臺灣史志中「客」所代表的人群意涵有兩種層次，即別於土著之客，及別於閩主而粵客。其中別於閩主而粵客之「客」，其所代表的人群意涵，亦與後世所認知的客家不盡相同。即使見諸於文獻中的「客」，有很大一部分就是後來我們認知的客家，但卻不應如此簡單地等同視之，因為清代臺灣史志中的「客」實包括了使用福佬方言的粵省潮州人，卻未包括使用客方言的閩省汀州府人。

不論是明清的華南地區，或是清代臺灣史籍中的「客」，其意涵有相似與相異之處。相似處在於，皆意指後至之流徙之民、耕佃身分，也一樣面臨土客（或主客）與主佃衝突，須為爭取自身權益而努力。但其相異處在於，清代臺灣，由於省籍與方言界線的交錯，閩主粵客，面對衝突時，客方言人群很難就方言群界線去全面凝聚共識；加上清代對人群的識別多以籍貫或地緣原則，因此，形諸於文獻，常見的反而是省籍的閩粵之分。清

代臺灣「客」與「非客」方言人群間的分類實情，由於與省籍界線交錯，在追究上，或應細緻到省級以下的州縣別或村鎮別的地域意識中，才可區分出來。往後對於清代臺灣漢人族群關係的相關研究，若能避免逕以文獻上「客」之書寫等同於客家民系，及能跳脫出「閩即福，粵即客」的迷思，應較能描繪出更貼近事實的歷史實相及族群關係。

徵引書目

(一)檔案

《月摺檔》（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光緒 7 年 2 月初 3 日，福建巡撫勒方錡奏摺抄件。

《外紀檔》（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道光 6 年 11 月 14 日，閩浙總督孫爾準奏摺抄件。

《軍機處檔·月摺包》（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乾隆 34 年 9 月 24 日，閩浙總督崔應階奏摺錄副。

《軍機檔道光朝》（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058972，道光 7 年 12 月 12 日。

《淡新檔案》（臺北國立臺灣大學藏）

編號 12203、12403。

(二)史料、方志

丁曰健，《治臺必告錄》，文叢第 17 種。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59

年。

丁紹儀，《東瀛識略》，文叢第 2 種。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57 年。
六十七，《使署閒情》，文叢第 122 種。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61
年（1746 年原刊）。

王大魯修，賴際熙纂，《赤溪縣志》。臺北：成文出版社，1967 年（1920
年原刊）。

王元，《甲戌公牘鈔存》，文叢第 39 種。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59
年。

王必昌，《重修臺灣縣志》，文叢 113 種。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61
年（1752 年原刊）。

王東，《客家學導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 年。

王瑛曾，《重修鳳山縣志》，文叢第 146 種。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
1964 年（1764 年原刊）。

丘逢甲，《嶺雲海日樓詩鈔》，文叢第 70 種。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
1960 年（1937 年原刊）。

左宗棠，《左文襄公奏牘》，文叢第 88 種。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60
年。

朱仕玠，《小琉球漫誌》，文叢第 3 種。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57
年。

余文儀，《續修臺灣府志》，文叢第 121 種。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
1962 年。

吳大猷，《四會縣志》。臺北：成文出版社，1968 年（1896 年原刊）。

吳子光，《臺灣紀事》，文叢第 36 種。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59
年。

周凱，《內自訟齋文選》，文叢第 82 種。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60
年（1840 年原刊）。

周鍾瑄，《諸羅縣志》，文叢第 141 種。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62

年（1717 年原刊）。

周璽，《彰化縣志》，文叢第 156 種。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62 年（1830 年原刊）。

姚瑩，《東槎紀略》，文叢第 7 種。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57 年（1829 年原刊）。

姚瑩，《中復堂選集》，文叢第 83 種。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60 年。

施士浩，《後蘇龔合集》，文叢第 215 種。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65 年。

柯培元，《噶瑪蘭志略》，文叢第 92 種。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61 年（1835 年原刊）。

范咸，《重修臺灣府志》，文叢第 105 種。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61 年（1746 年原刊）。

郁永河，《裨海紀遊》，文叢第 44 種。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59 年。

倪贊元，《雲林縣采訪冊》，文叢第 37 種。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59 年。

唐贊袞，《臺陽見聞錄》，文叢第 30 種。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58 年。

徐宗幹，《斯未信齋文編》，文叢第 87 種。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60 年。

高拱乾，《臺灣府志》，文叢第 65 種。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60 年（1696 年原刊）。

國立故宮博物院編，《宮中檔乾隆朝奏摺》，第 1、12 輯。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1982 年。

屠繼善，《恒春縣志》，文叢第 75 種。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60 年。

- 張煜南，《梅水詩傳》。臺北：張穎基，1973 年（1901 年原刊）。
- 陳文達，《臺灣縣志》，文叢第 103 種。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61 年（1720 年原刊）。
- 陳文達，《鳳山縣志》，文叢第 124 種。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61 年（1720 年原刊）。
- 陳國瑛等，《臺灣采訪冊》，文叢第 55 種。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59 年。
- 陳淑均，《噶瑪蘭廳志》，文叢第 160 種。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63 年（1807 年原刊）。
- 賀長齡，《耐庵奏議》。臺北：成文出版社，1968 年（1881 年原刊）。
- 黃叔璥，《臺海使槎錄》，文叢第 4 種。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57 年（1722 年原刊）。
- 溫仲和，《嘉應州志》。臺北：成文出版社，1968 年（1898 年原刊）。
- 溫廷敬輯，《茶陽三家文鈔》。臺北：文海出版社，1967 年。
- 葉覺邁修，陳伯陶纂，《東莞縣志》。臺北：成文出版社，1967 年（1921 年原刊）。
- 熊學源修，李寶中纂，《增城縣志》。臺北：成文出版社，1974 年（1820 年原刊）。
- 翟灝，《臺陽筆記》，文叢第 20 種。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58 年。
- 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同治甲戌日兵侵臺始末》，文叢第 38 種。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59 年。
- 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安平縣雜記》，文叢第 52 種。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59 年。
- 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馬關議和中之伊李問答》，文叢第 43 種。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59 年。
- 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臺東州采訪冊》，文叢第 81 種。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60 年（1896 年原刊）。

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福建通志臺灣府》，文叢第 84 種。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60 年。

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欽定平定臺灣紀略》，文叢第 102 種。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61 年。

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臺灣私法人事編》，文叢第 117 種。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61 年。

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臺灣私法商事編》，文叢第 91 種。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61 年。

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臺灣私法物權編》，文叢第 150 種。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63 年。

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清初海疆圖說》，文叢第 155 種。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62 年。

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臺案彙錄丙集》，文叢第 176 種。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63 年。

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臺案彙錄己集》，文叢第 191 種。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64 年。

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清高宗實錄選輯》，文叢第 186 種。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64 年。

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清宣宗實錄選輯》，文叢第 188 種。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64 年。

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清文宗實錄選輯》，文叢第 189 種。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64 年。

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海濱大事記》，文叢第 213 種。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65 年。

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清經世文編選錄》，文叢第 229 種。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66 年。

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臺灣南部碑文集成》，文叢第 218 種。臺北：臺

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66 年。

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清耆獻類徵選編》，文叢第 230 種。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67 年。

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臺灣詩鈔》，文叢第 280 種。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70 年。

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道咸同光四朝奏議選輯》，文叢第 288 種。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71 年。

劉良璧，《重修福建臺灣府志》，文叢第 74 種。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61 年（1741 年原刊）。

蔣師轍，《臺游日記》，文叢第 6 種。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57 年。

鄭鵬雲、曾逢辰編，《新竹縣志初稿》，文叢第 61 種。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59 年。

鄧傳安，《蠡測彙鈔》，文叢第 9 種。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58 年。

盧德嘉，《鳳山縣采訪冊》，文叢第 73 種。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60 年（1894 年原刊）。

錢儀吉，《碑傳選集》，文叢第 220 種。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66 年。

謝金鑾，《續修臺灣縣志》，文叢第 140 種。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62 年（1831 年原刊）。

藍鼎元，《東征集》，文叢第 12 種。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58 年。

藍鼎元，《平臺紀略》，文叢第 14 種。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58 年。

羅大春，《臺灣海防並開山日記》，文叢第 308 種。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72 年。

羅翹雲，《客方言》。臺北：古亭書屋，1972 年（1922 年原刊）。

顧炎武，《天下郡國利病書·七·福建、廣東、廣西》，四部叢刊三編史部。

臺北：四庫善本叢書館，1959 年。

(三)專書

王重民等編，《太平天國(六)》。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 年。

司徒尚紀，《廣東文化地理》。韶關：廣東人民出版社，1993 年。

江立華、孫洪濤，《中國流民史·古代卷》。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2001 年。

何國強，《圍屋裡的宗族社會：廣東客家族群生計模式研究》。南寧：廣西民族出版社，2002 年。

何翠萍、蔣斌，《國家、市場與脈絡化的族群》。臺北：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2003 年。

吳松弟，《中國移民史》，第 4 卷，遼宋金元時期。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7 年。

宋德釗，《民間文化與鄉土社會》。梅縣：花城出版社，2002 年。

李如龍，《福建方言》。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0 年。

李新魁，《廣東的方言》。韶關：廣東人民出版社，1994 年。

汪毅夫，《臺灣社會與文化》。福州：海峽文藝出版社，1994 年。

周振鶴、游汝杰，《方言與中國文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 年。

屈大均，《永安縣次志》，收於《屈大均全集》，第 6 冊。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96 年。

陳支平，《客家源流新論：誰是客家人》。臺北：臺原出版社，1998 年。

陳智勇，《中國古代社會治安史》。鄭州：鄭州大學出版社，2003 年。

黃宇和，《兩廣總督葉名琛》。上海：世紀出版集團、上海書店出版社，2004 年。

黃淑聘，《廣東族群與區域文化研究》。廣州：廣東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 年。

劉平，《被遺忘的戰爭—咸豐同治年間廣東土客大械鬥研究》。北京：商務

印書館，2003 年。

劉佐泉，《客家歷史與傳統文化》。開封：河南大學出版社，2003 年。

劉曉春，《儀式與象徵的秩序——一個客家村落的歷史、權力與記憶》。北京：商務印書館，2003 年。

鄭昌時，《韓江聞見錄》。香港：香港潮州會館，1979 年。

謝重光，《客家形成發展史綱》。廣州：華南理工大學出版社，2001 年。

羅香林，《客家史料匯篇》。臺北：南天書局，1992 年。

羅香林，《客家研究導論》。臺北：南天書局，1992 年。

瀨川昌久，《客家：華南漢族のエスニティーとその境界》。東京都：株式會社風響社，1993 年。

Leong Sow-Theng, *Migration and Ethnicity in Chinese History: Hakkas, Pengmin and their Neighbors*。臺北：南天書局，1998 年。

(四)論文

尹章義，〈臺灣移民開發史上與客家人相關的幾個問題〉，《中國海洋發展史論文集(四)》。臺北：中央研究院三民主義研究所，1991 年。

尹章義，〈臺灣族群關係與地方開發比較研究法——以臺北及高屏地區為例〉，《客家文化研究通訊》，第 2 期（1999 年 6 月）。

王明珂，〈民族史的邊緣研究：一個史學與人類學的中介點〉，《新史學》，4 卷 2 期（1993 年 6 月）。

王明珂，〈周人的族源與華夏西部族群邊界的形成〉，《大陸雜誌》，87 卷 2 期（1993 年 8 月）。

王明珂，〈過去的結構——關於族群本質與認同變遷的探討〉，《新史學》，5 卷 3 期（1994 年 9 月）。

王明珂，〈漢族邊緣的羌族記憶與羌族本質〉，收入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從周邊看漢人的社會與文化》。臺北：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1997 年。

王東，〈「贛閩粵邊：一個方言群的歷史與神話」研究計劃〉，《客家文化研究通訊》，第5期（2003年2月）。

池子華，〈土客衝突的文化學考察—以近代江南地區為例〉，《河北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5卷1期（2000年2月）。

宋光宇，〈論客家原義〉，《客家文化研究通訊》，第4期（2001年12月）。

李文良，〈清初臺灣方志的「客家」書寫與社會相〉，《臺大歷史學報》，第31期（2003年）。

周大鳴，〈從「漢化」到「畬化」談族群的重構與認同—以贛南畬族為例〉，收入中南民族大學民族學與社會學學院編，《族群與族際交流》。北京：民族出版社，2003年。

林正慧，〈閩粵？福客？清代臺灣漢人族群關係新探—以屏東平原為起點〉，《國史館學術集刊》，第6期（2005年9月）。

唐立宗，〈敬恭桑梓：近代廣東志書的編纂活動與「客家」途述〉，發表於「第二屆客家研究研究生論文研討會」，2002年12月。

唐立宗，〈清代廣東方志的「客民」、「客匪」與「客家」論述〉，發表於「北京第四屆青年學者論壇」，2005年。

高怡萍，〈徘徊於聚族與離散之間—粵東客家的族群論述與歷史記憶〉，國立清華大學人類學研究所博士論文，2004年。

張世明、龔勝泉，〈另類社會空間：中國邊疆移民社會主要特殊性透視（1644-1949）〉，《中國邊疆史地研究》，2006年第1期。

張應斌、謝友祥，〈黃遵憲的客家源流觀〉，《汕頭大學學報（人文科學版）》，16卷4期（2000年）。

許懷林，〈棚民·客籍·客家意識—義寧州客家的歷史實際〉，《嘉應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18卷2期（2000年）。

陳坤，〈粵東剿匪紀略〉，《四庫未收書輯刊》，第3輯第13冊。北京：北京出版社，2000年。

陳春聲，〈清末民初潮嘉民眾關於「客家」的觀念—以《嶺東日報》的研究

- 為中心》，收入陳支平、周雪香編，《華南客家族群追尋與文化印象》。
合肥：黃山書社，2005年。
- 鈔曉鴻，〈晚清時期陝西移民入遷與土客融合〉，《中國社會經濟史研究》，
1998年第1期。
- 楊國安，〈主客之間：明代兩湖地區土著與流寓的矛盾與衝突〉，《中國農
史》，2004年第1期。
- 楊聰榮，〈從族群關係史看臺灣客家的分類範疇與獨特性〉，發表於「臺灣
史學客家研究研討會」，2004年5月26日。
- 賈叢江，〈釋「土著」〉，《西域研究》，2005年第4期。。
- 趙以武，〈淺談客家研究中的幾個問題〉，《客家研究輯刊》，2000年第2期。
- 劉勁峰，〈積累與嬗變—略論客家民系的形成過程〉，《客家研究輯刊》，
2001年第1期。
- 劉曉春，〈民俗學問題與客家文化研究—從民間文化研究的普同性與線性
視野之困境反思客家研究〉，《江西社會科學》，2004年第1期。
- 劉麗川，〈論清代粵臺兩地客民稱謂之異同〉，《深圳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
學版）》，21卷2期（2004年）。
- 蔣炳釗，〈試論客家的形成及其與畬族的關係〉，收入《閩臺社會文化比較
研究工作研討會論文集》。臺北：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1994年。
- 賴旭貞，〈佳冬村落之宗族與祭祀—臺灣客家社會個案研究〉，中正大學歷
史所碩士論文，1999年。
- 鍾幼蘭，〈臺灣民間社會人群結合方式的構成與發展—以臺中縣神岡鄉大
社村為例〉，收入《臺灣與福建社會文化研究論文集(三)》。臺北：中央
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1996年。
- 羅烈師，〈客家族群與客家社會：臺灣竹塹地區客家社會之形成〉，收入徐
正光編，《聚落、宗族與族群》。臺北：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2001
年。
- 嚴忠明，〈「豐湖雜記」與客家民系形成的標誌問題〉，《西南民族大學學報·

人文社科版》，25 卷 9 期（2004 年）。

饒偉新，〈區域社會史視野下的「客家」稱謂由來考論—以清代以來贛南的「客佃」、「客籍」與「客家」為例〉，《民族研究》，2005 年第 6 期。